亞洲公益慈善研究計劃
中期報告

2026年9月

Commission on Asian Philanthropy
亞洲公益慈善研究計劃

關於報告封面設計

封面設計靈感源自研究計劃所涵蓋國家和地區的文化遺產、
象徵性圖案及多元自然風貌。

目錄

前言：亞洲公益慈善研究計劃 4

執行摘要 7

基礎概念：政府的作用與亞洲語境下公益慈善的定義 14

中期報告：核心啟示 16

啟示一：全面審視系統規模 17

啟示二：重新構想公益慈善潛力 27

啟示三：攜手共建未來十年 37

最終報告展望 48

鳴謝 49

詞彙表 53

前言：

亞洲公益慈善研究計劃

亞洲公益慈善研究計劃於2024年9月起動，為期三年、以研究為基礎，旨在透過梳理和相互參照亞洲各國家和地區的公益慈善經驗，協助提升亞洲公益慈善生態系統的規模、質量與影響力，推動未來二十年間的普惠包容與可持續增長。合作機構匯聚多家東亞、東南亞、南亞和西亞地區具代表性的公益慈善機構，融合來自不同文化傳統、政治體制及發展模式的實踐經驗。

研究計劃邁入中期，藉此報告向政策制定者及決策者作出以下匯報：

- 首次全面估算亞洲公益慈善生態系統的範圍與規模；
- 以長遠角度展望各生態系統在服務國家戰略方面的潛能；
- 誠邀各方同舟共濟，充分發揮潛能，推動亞洲成為全球普惠包容與可持續增長的引領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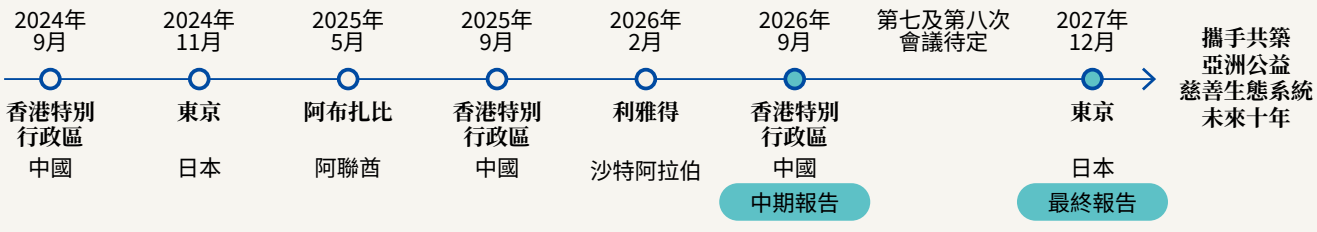
亞洲各地政治體制、文化傳統和發展階段不一，公益慈善事業的制度、組織形態與運作邏輯豐富多樣。研究計劃充分尊重各國家與地區因地制宜探索最適合的公益慈善發展方向。本報告並非倡導單一模式或外部標準，乃旨在鼓勵各方互學互鑑，促進亞洲公益慈善事業的蓬勃發展，為各國家與地區在既有制度下完善公益慈善生態系統提供參考。

未來一年，研究計劃將積極與政策制定者及決策者深入交流，匯集各方洞見，為最終報告中的行動路線圖奠下基礎，共同描繪亞洲公益慈善生態系統未來十年的發展藍圖。

合作機構

中國	中國宋慶齡基金會 騰訊公益慈善基金會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印度	塔塔諮詢服務 皮拉馬爾基金會
印度尼西亞(印尼)	Yayasan Dompet Dhuafa Republika
日本	日本財團
沙特阿拉伯王國(沙特阿拉伯)	哈立德國王基金會
馬來西亞	哈桑娜基金會
新加坡	淡馬錫基金會 陳江和基金會
泰國	開泰基金會
阿拉伯聯合酋長國(阿聯酋)	Erth Zayed Philanthropies

會議安排



合作機構

中國宋慶齡基金會 CHINA SOONG CHING LING FOUNDATION

مؤسسة إرث زايد الإنساني ERTH ZAYED PHILANTHROPIES

DOMPET DHUAFA

Kasikornthai Foundation All from heart, for all Thai.

مؤسسة الملك خالد KING KHALID FOUNDATION

Piramal Foundation

Tanoto Foundation

TATA CONSULTANCY SERVICES

TEMASEK Foundation

腾讯基金会 TENCENT FOUNDATION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The Hong Kong Jockey Club Charities Trust

日本財団 THE NIPPON FOUNDATION

YAYASAN HASANAH

ADVANCING MALAYSIA

聯合召集機構

ASIA PHILANTHROPY CONGRESS

公益慈善研究院 Institute of Philanthropy

研究秘書處

VOYAGE

平台合作夥伴

avpn

執行摘要



未來二十年是亞洲發展的關鍵時期：2050年實現普惠包容和可持續增長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努力

現時全球逾六成人口位於亞洲，區內貿易額佔全球超過三分之一，本地生產總值（GDP）佔全球近一半，財富則佔全球37%[註1]。過去二十年，已有超過十億人成功擺脫極端貧窮。[註2]

然而，目前仍有數以億計人口面對生計、教育及醫療等基本需要的挑戰，隨着亞洲社會面臨人口老化、氣候變化及相關災害、科技發展帶來的急速轉變，以及全球局勢不穩，這情況變得日益複雜。

未來二十年是亞洲發展的關鍵時期。亞洲主要經濟體對2050年實現普惠包容與可持續增長抱有共同願景。衡量發展成效的標準不再只是本地生產總值增長，更需涵蓋社會與環境福祉，確保社會的發展成果能惠及大眾。中國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提出到本世紀中葉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實現。[註3]印度的「發達印度2047願景」（Viksit Bharat 2047）指出，印度的包容性發展有賴於賦能青年、貧困家庭、婦女和農民。[註4]印尼的「黃金印尼2045願景」（Golden Indonesia 2045）致力於在2045年前消除公民極端貧困，並將貧困率控制在0.5% — 0.8%之間。[註5]

亞洲的公益慈善生態系統能夠凝聚社會，乃服務國家發展、需要悉心培育的戰略性資產

上述國家願景皆強調整體社會必須群策群力，賦能基層社區／社群，促使推動社會發展的三大引擎——政府、市場與社會，以更緊密、高效的方式合作，服務國家戰略及發展重點，傾力實現普惠包容與可持續發展。

基於這個共同目標，本報告提出以下核心論點：亞洲的公益慈善生態系統能凝聚社會，乃服務國家發展、需要悉心培育的戰略性資產。

1 本報告依據聯合國統計司（UNSD）的M49區域分類界定亞洲範圍。估算基於以下來源：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24*, online ed.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24);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orld Trade Statistics,"2026年7月訪問；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DataMapper*, "GDP Based on PPP, Share of World," 2026年7月訪問；*James Davies et al., Global Wealth Databook 2023* (Zurich: UBS, 2023).

2 估算依據：Christoph Lakner et al., *Reproducibility Package for Poverty, Prosperity and Planet Report 2024* (World Bank, 2025), updated with the Poverty and Inequality Platform (March 2026).

3 習近平，《紮實推動共同富裕》，求是，2021年第20期。

4 "Address by the Hon' ble President of India Smt. Droupadi Murmu to Parliament," President' s Secretariat, Government of India, January 31, 2024.

5 *Undang-Undang Republik Indonesia Nomor 59 Tahun 2024 tentang Rencana Pembangunan Jangka Panjang Nasional Tahun 2025–2045* (Law of the Republic of Indonesia No. 59 of 2024 concerning the National Long-Term Development Plan for 2025–2045), September 13, 2024.

基於迄今取得的研究成果，亞洲公益慈善研究計劃在本中期報告中向政策制定者及決策者提出三大核心啟示。

1. 亞洲公益慈善生態系統規模遠超傳統估算，潛在貢獻遠超資金本身

研究計劃估算，其覆蓋的國家與地區於2024年的本土公益慈善資金捐贈總額達1,092億美元（約8,518億港元），未來十年累計將超過1萬億美元（約7.8萬億港元）。[註6]在1,092億美元中，548億美元（約4,274億港元）來自大眾個人捐贈，273億美元（約2,129億港元）來自企業捐贈，230億美元（約1,794億港元）來自公共可支配公益慈善資源，40億美元（約312億港元）來自超高淨值人士捐贈。由此可見，亞洲的公益慈善事業並非由單一模式主導，而是由五種公益慈善模式，包括社區／社群主導型、信仰驅動型、企業主導型、政府主導型以及超高淨值人士主導型，共同拓展、動員不同的捐贈來源，落實各類公益慈善資金，持續推動本土公益慈善發展。

這五種公益慈善模式的捐助理念和資助取向不一，除了提供資金外，亦能為社會發展帶來不同價值，包括可靠的「最後一公里」網絡、凝聚共同價值的能力、企業資源和專業能力、公眾對制度的信任，以及作出長遠和持續承擔的能力。

2. 亞洲公益慈善生態系統有助提升國家推動發展目標的能力

公益慈善生態系統透過善用其資源、網絡及專業能力，支持政府凝聚社區力量，並加強政府、市場與社區之間的合作基礎。這些基礎包括制度安排、合作機制、社會規範及溝通渠道，有助建立互信，促進不同界別攜手合作，共同推進國家的長遠發展目標。

以中國的脫貧攻堅戰為例。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和國家戰略主導下，2013年至2020年間，中國實現了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註7]中國建立了「五級書記抓扶貧」的責任體系，累計向貧困村派駐25.5萬個駐村工作隊、超過300萬名幹部。中國建立的協同機制中，一項重要制度安排是東西部扶貧協作機制。該機制推動東部較發達地區與中西部573個貧困縣結對幫扶。[註8]在這個政府主導的制度框架下，政府主導及企業主導的慈善模式為這種協作機制提供支持，透過投入資源和專業能力，將政策、服務和支援更有效地觸及最有需要的人士。

6 公益慈善規模估算涵蓋研究計劃所有有足夠且已驗證數據的國家與地區；阿聯酋企業捐贈的部分數據單獨列示，詳見圖4。研究計劃涵蓋的國家與地區合計佔亞洲人口的70%和GDP的80%。
7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人類減貧的中國實踐》白皮書，北京，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21年4月。
8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人類減貧的中國實踐》白皮書，2021。

另一案例是印度的鄉村生計改善。比哈爾邦是印度收入最低、人口最多的邦之一，2014年至2023年的十年間，約3,800萬人擺脫了多維貧困（multi-dimensional poverty）。[註9]政府主導型與社區／社群主導型公益慈善模式在此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兩者通力合作，通過將1,200萬農村婦女組織成超過100萬個自助小組（SHGs）。[註10]這套基礎設施改變了普惠金融的格局，使社區能夠獲得47億美元（約367億港元）的信貸。這進一步提升了政府向最弱勢群體提供公共服務的成效。自助組織作為植根社區的「最後一公里」，協助服務深入社區，在降低公共服務成本的同時，提高公共支出的回報率。

這些案例顯示，亞洲公益慈善生態系統的影響力不僅限於資金投入。當各類慈善力量發揮其互補優勢，提供資源與能力，強化社區並促進三大引擎之間的合作，便能創造更大的集體影響力，推動更深層次的系統性改變。

3. 公益慈善生態系統需要策略性投資，方能成為推動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而亞洲各地的經驗分享則可以加快進程

要充分發揮公益慈善生態系統的作用，協助國家更有效推動重要發展目標及優先事項，各地需要在三個關鍵範疇作出針對性投資。

1. **提升公益慈善生態系統資源與能力方面的數據可見度。**例如，研究計劃支持印尼宗教事務部開展一項全國公眾調查。根據調查結果估算，2025年「天課」（zakat mal）及「自願捐贈和施捨」（infak and sedekah）兩種以扶貧為主要目的的伊斯蘭公益慈善捐贈規模約為150億美元（約1,170億港元）。這些捐獻背後，是遍布基層、深受信任的「最後一公里」非正式網絡；它們動員社會資本，在大規模提升社區韌性和推動經濟賦能方面發揮重要作用。隨着印尼推進其國家扶貧使命，兩者共同構成一股龐大而尚待深入理解的力量。

9 Government of India, NITI Aayog,《24.82 Crore Indians Escape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 Last 9 Years,》*Press Information Bureau*, January 15, 2024.
10 World Bank Group,《Unleashing the Power of Women's Collectives for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Indian State of Bihar,》*Results Brief*, World Bank, October 20, 2020.

2. **借鑑增長經驗彙編，培育多元公益慈善模式。**研究計劃整理了各地推動本土公益慈善發展的12套增長經驗彙編，其中6套已具相當規模，每年所帶動的捐贈金額超過10億美元（約78億港元）。這些慈善模式仍有進一步發展空間，釋放其潛力有賴具前瞻性的領導、持續的政策支持及本地資源投入。研究計劃估計，若各地能加強經驗交流，持續創新和完善相關發展策略，未來十年可額外帶動1,890億美元（約1.47萬億港元）的慈善捐贈。

3. **將公益慈善生態系統納入國家發展規劃的重要戰略資產。**負責規劃及財政工作的政府部門可透過與公益慈善生態系統建立更緊密的夥伴關係，動員更多資源、能力及社會力量，共同推進國家的重要發展目標。例如，馬來西亞財政部提出「提升人民福祉」（Raise the Floor）的願景，積極運用政府關聯公司及其慈善機構所擁有的資源和專業能力，在社區發展、生計改善及教育等領域協調推行和具規模的項目，提升整體社會效益。

互學互鑑以加速本土公益慈善事業發展

各國家和地區依據自身情況探索合適的公益慈善發展方向，同時亦可憑藉區域合作，加速發展進程。其關鍵在於投放資源，以訂立共同的指導原則及實踐方針、項目設計框架及數據分類體系；並建立促進互相學習的機制，分享實證案例，展示公益慈善生態系統如何推進實現普惠包容及可持續增長的國策。

本中期報告旨在梳理亞洲公益慈善事業的發展經驗，辨識互學互鑑的機遇，並為各國家和地區的政策制定者及決策者建言獻策，以共同推動亞洲公益慈善生態系統發展。

我們誠摯希望在未來一年與各方開展深入交流，探討本報告的啟示，共商制定將於2027年底最終報告發佈的行動路線圖，以指引未來十年公益慈善生態系統的發展。

1 重要性：到2050年實現普惠包容與可持續增長是亞洲面臨的下一個發展挑戰，這需要全社會同心協力。

至2050的國家願景

示例：

中國

到本世紀中葉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實現

印度

發達印度2047願景

印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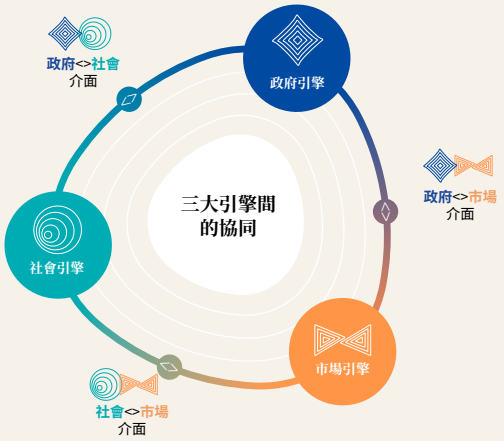
黃金印尼2045願景

強調普惠包容與可持續增長的國家戰略和發展重點

示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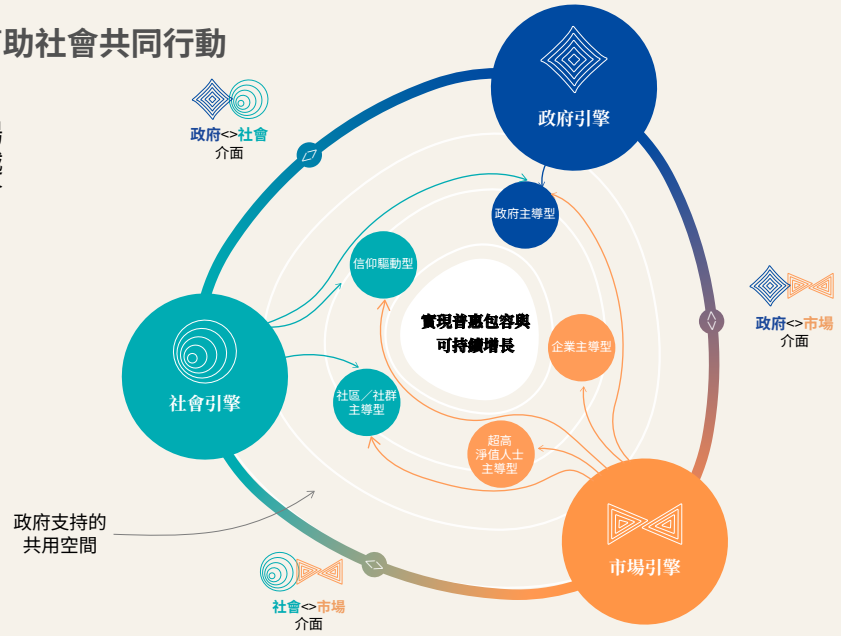
- 脫貧與生計改善
- 鄉村／區域振興
- 應對人口老化
-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新時代推動技能培訓與終身學習
- 氣候變化與能源轉型

願景和戰略的實踐需要全社會同心協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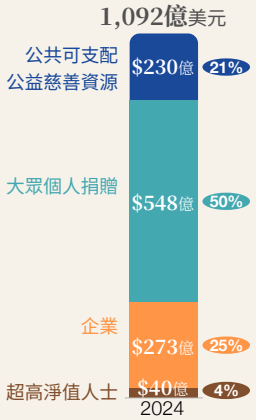
2 亞洲公益慈善生態系統可以幫助社會共同行動

在亞洲，公益慈善並非獨立於政府、市場及社會之外運作，而是由該三方自發超越財政或商業義務，共同致力於更大的社會福祉，匯聚成公益慈善生態系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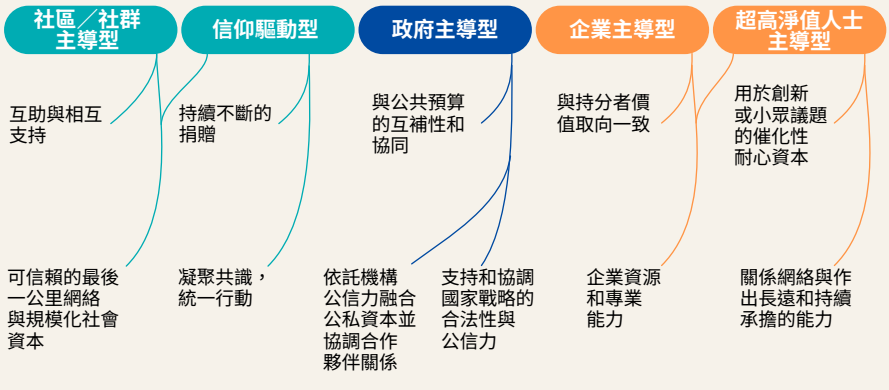


3 研究建議：將公益慈善生態系統培育成為重要戰略資產

研究計劃各國家與地區資金性捐贈規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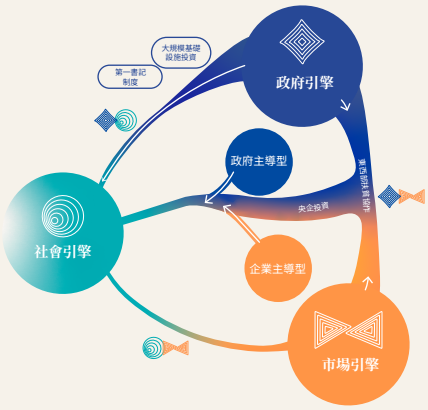
超越資金：公益慈善生態系統五種公益慈善模式反映不同理念並為發展提供寶貴能力



4 公益慈善生態系統有助政府鞏固社區力量，並強化三大引擎之間的協同機制，以配合國家戰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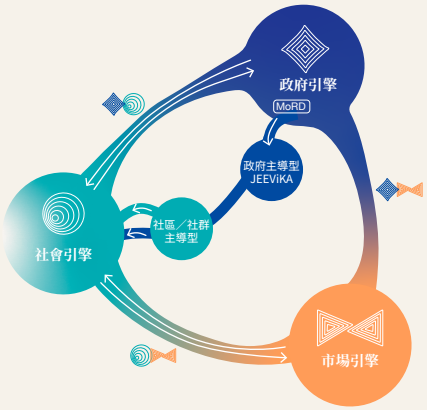
中國和印度的案例表明公益慈善生態系統有助力國家戰略實施的潛力，值得納入發展規劃進行統籌

中國的脫貧攻堅戰略：2013年至2020年間，中國實現了9,899萬農村絕對貧困人口脫貧



中國的公益慈善生態系統在政府的領導下緊密配合國家戰略，政府主導型與企業主導型公益慈善在放大東西部扶貧協作機制在最後一公里的影響力方面發揮重要協同作用。

印度比哈爾邦鄉村生計改善：2014年至2023年期間約3,800萬人成功擺脫多維貧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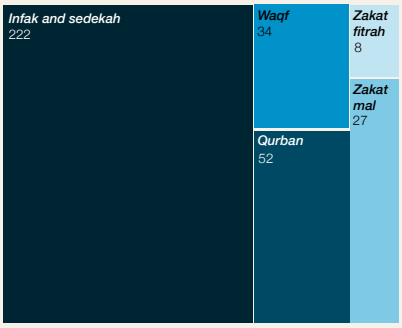


政府主導型與社區／社群主導型公益慈善組織共同致力於賦能社會引擎，將超過1,200萬農村婦女動員納入100多萬個自助小組，大規模重塑社會與政府和市場在減貧和改善民生方面的協作機制。

5 通過三項針對性投資，促使公益慈善生態系統更有效地發揮作用，充分展現潛在影響力

1. 提升數據可見度，如印尼宗教事務部伊斯蘭慈善全國調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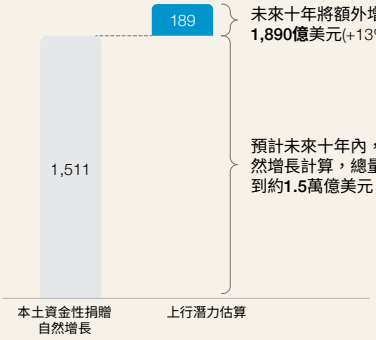
按類別分的2025年伊斯蘭大眾捐贈，
印尼盾，萬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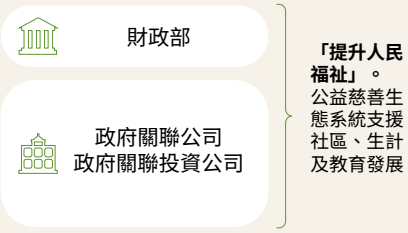
總計 = **343萬億(208億美元)**

2. 通過增長經驗彙編互學互鑑培育公益慈善模式以在2027至2036年間額外釋放1,890億的資金性捐贈

十億美元，按2024年價格水準計價



3. 將公益慈善生態系統納入國家戰略統籌中。如馬來西亞財政部調動其公益慈善生態系統以確保最弱勢群體的包容性增長



6 行動呼籲：在未來一年與研究計劃攜手共繪行動路線圖，推動公益慈善生態系統實現普惠包容與可持續增長

經來年進一步磋商後，行動路線圖將被納入研究計劃的最終報告



基礎概念：政府的作用與亞洲語境下公益慈善的定義

政府的角色與亞洲公益慈善的定義

就亞洲的情況而言，公益慈善的定義及其作用與政府對公益慈善事業的定位密切相關。政府在亞洲公益慈善生態系統中扮演着多重角色，並在以下三個層面上同時發揮作用：

- **賦能環境層面：**政府制定公益慈善生態系統的規則與監管框架，讓持分者參與。

- **捐贈來源層面：**政府與社會及市場共同投入，向公益慈善生態系統注入新的資源。研究計劃將政府促使的投入稱為「公共可支配公益慈善資源」(public discretionary giving)。
  - 公共可支配公益慈善資源的界定標準包括：其用途必須符合規定(用於財政職責之外的公共利益)且必須有健全的資金分配管治架構。[註11]它包括主要目的為調動非政府公益慈善資源的配捐資金、彩票公益金、休眠存款以及特定徵費。它不包括政府用於履行財政職責提供服務的開支，如常規教育、醫療衞生、福利或發展支出。[註12]

- **行為主體層面：**政府通過其資助或設立的機構，以政府主導型公益慈善模式的形式作為行為主體參與其中，為國家優先發展事項籌集和分配資源，並協調各方合作。公益慈善性質的界定取決於主體所管理的資源類別，而非主體自身性質。政府作為主體可能在管理用於發展目的的法定財政預算(不被視為公益慈善資源，而是公共預算)的同時，又作為政府主導型的公益慈善機構運作，籌集和分配公益慈善資源。在此情況下，政府主導型模式並不局限於僅支配公共可支配公益慈善資源。在亞洲部分國家或地區，這類機構籌集並分配的公益慈善資源並非來自單一引擎，使其在融合公共與私人資源，以及協調跨部門合作以實現國家戰略和優先發展事項方面發揮獨特的作用。從事此類工作的機構可能包括多種形式的政府關聯機構。這些機構在不同國家和地區有不同稱謂，如政府背景的公益慈善組織、自治公共組織、管理局、理事會，及政府建立的協會、信託或公益慈善團體。

11 管治架構因各國家和地區而異，例如：獨立於各職能部門、擁有資源分配自由裁量權的機構；由中央和／或協調部門(如財政部、內閣辦公室和總統府)管轄的機構；以及代表多個部門的機構。

12 稅務優惠及其他政府為鼓勵公益慈善捐贈而導致的財政減收不計入公共可支配公益慈善資源。這些政策對已被計入公益慈善總量的社會捐贈給予補貼，因此若再計入將導致重複計算。此類激勵措施是賦能環境層面的一部分，代表政策選擇，即在多大程度上激勵或強制捐贈。研究計劃採用的公共可支配公益慈善資源完整定義及各國家及地區案例，詳見附件2。

研究計劃對公益慈善的定義

研究計劃將公益慈善定義為：在財政或商業義務以外，自主分配私人或公共資源以惠及他人。

按照此定義，三大引擎均參與公益慈善事業。這定義較亞洲以外地區常見的「為公共利益而進行的私人自願捐贈」定義更為廣泛，以體現亞洲許多國家和地區普遍存在的兩方面差異。

第一，此定義反映政府在賦能環境、捐贈來源和行為主體三個層面均發揮作用，其中在捐贈來源層面直接貢獻公共可支配公益慈善資源。該類資源有別於政府常規的財政支出。

第二，研究計劃在調研中發現，亞洲部分地區的公益慈善實踐並不以「完全自願」為先決條件。在一些國家或地區，法律或信仰所要求的捐贈，在其自身語境中仍被廣泛理解為公益慈善行為的一種體現。在這種情況下，捐贈者可以自行決定如何運用或分配資源以造福他人。要求捐贈必須出於自願，將會把許多社區／社群公認屬於公益慈善性質的捐贈排除在外。

因此，在按捐贈來源量化公益慈善資源時，研究計劃納入所有形式的服務於公共利益的私人資源，以及符合研究計劃界定標準的公共可支配公益慈善資源。至於公益慈善模式方面，則涵蓋不論是通過運營自身項目或是向第三方捐贈，所有為他人利益而籌集和分配公益慈善資源與能力的參與者。

中期報告：核心啟示

1. 全面審視系統規模

亞洲公益慈善生態系統規模遠超傳統估算，潛在貢獻遠超資金本身。

2. 重新構想公益慈善潛力

亞洲公益慈善生態系統有助提升國家推動發展目標的能力。

3. 攜手共建未來十年

公益慈善生態系統需要策略性投資，方能成為推動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而亞洲各地的經驗分享則可以加快進程。



啟示一：

全面審視系統規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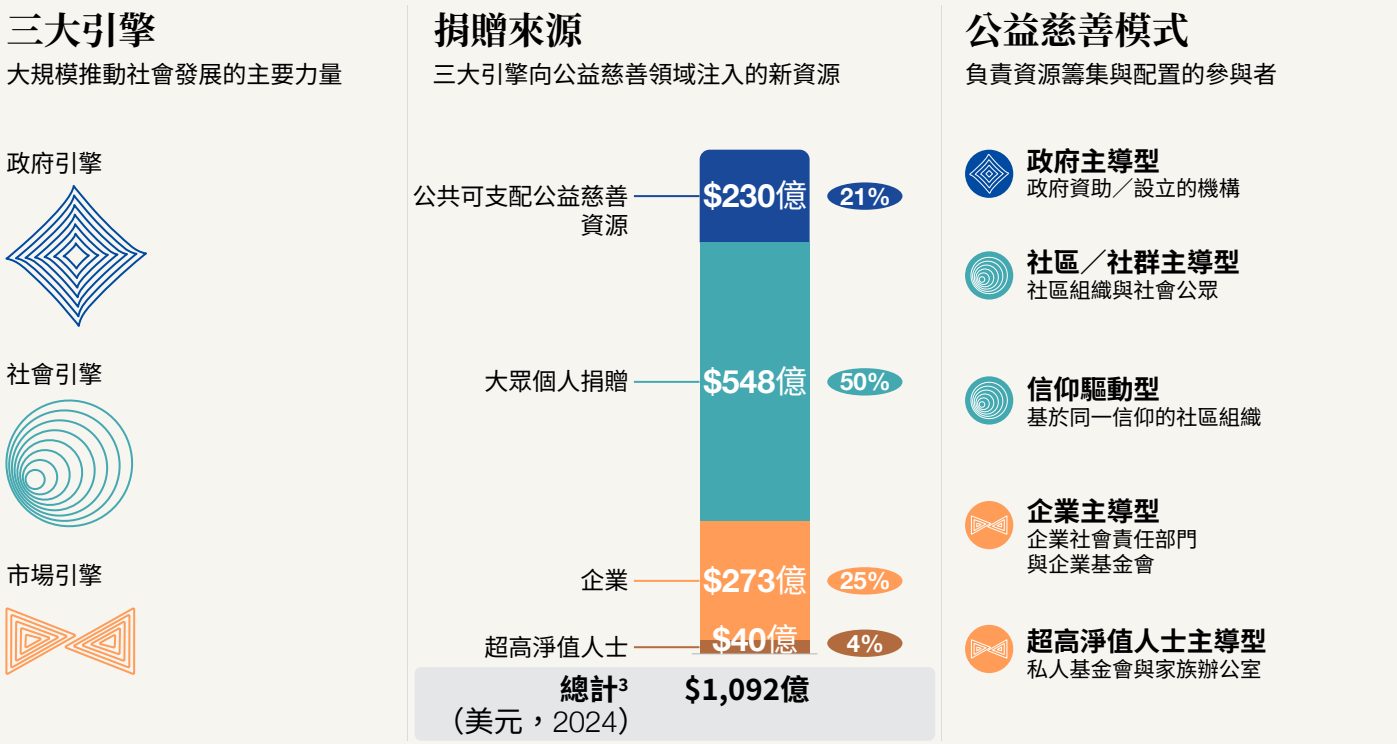
亞洲公益慈善生態系統規模遠超傳統估算，潛在貢獻遠超資金本身

研究計劃估算，2024年亞洲公益慈善生態系統本土資金捐贈總額達1,092億美元(約8,518億港元)，未來十年累計將超過1萬億美元(約7.8萬億港元)。(註13)

可觀的資金組成，反映公益慈善生態系統的多元組成及參與。如圖1所示，三大引擎(政府、社會與市場)共同驅動四大資金來源，並透過五種公益慈善模式進行資源的籌集、轉化與分配，成就亞洲公益慈善生態的獨特格局。

在亞洲，公益慈善並不被視為一個獨立於政府、市場及社會引擎之外的獨立部門。相反，它所包含的五種公益慈善模式，正是政府、市場與社會「三大引擎」的縮影，其思維框架、資源與能力體系皆深植於三大引擎之中。由此可見，公益慈善生態系統在各國與地區都佔據著重要地位。正如圖2中心區域所示：三大引擎在

圖 1
2024年亞洲本土公益慈善生態系統規模估算[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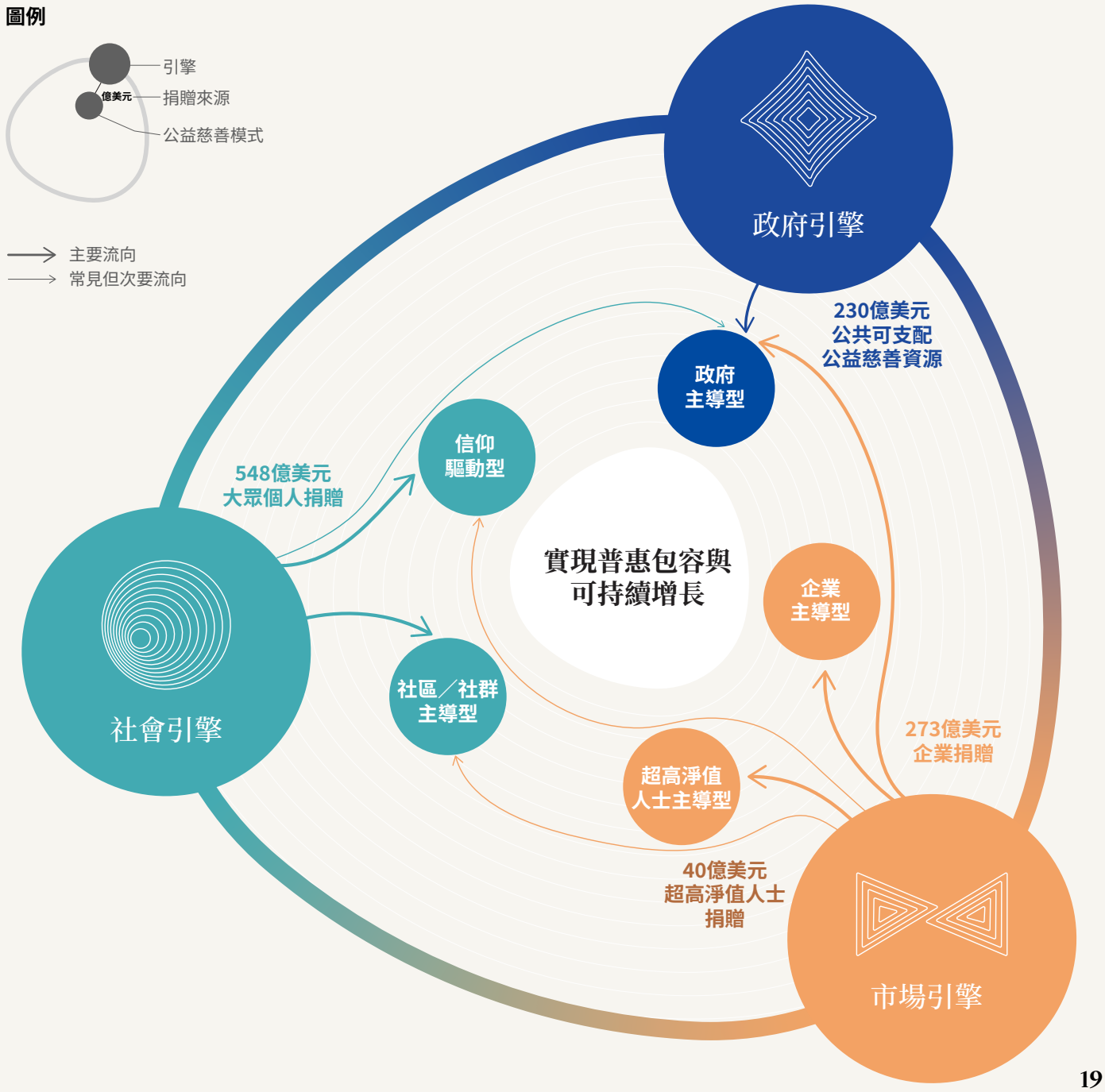


1. 規模估算涵蓋研究計劃所有國家和地區，佔亞洲人口的70%和GDP的80%。有關估算方法和資料來源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附件 2: 量化方法，各國家與地區估算及建議；
2. 整體而言，相對於本土捐贈而言，跨境公益慈善捐贈規模較小。2024年研究計劃估算各國家與地區可查的跨境公益慈善捐贈總額為約14億美元；
3. 由於四捨五入，總計或不等於圖示各項之和。

13 公益慈善規模估算涵蓋研究計劃所有有足夠且已驗證數據的國家與地區；阿聯酋企業捐贈的部分數據單獨列示，詳見圖4。研究計劃涵蓋的國家與地區合計佔亞洲人口的70%和GDP的80%。超過1兆美元(約7.8兆港元)的估算尚未計入自然增長。如果將自然增長假設納入估算，未來十年的累計總額將達到1.5兆美元(約11.7兆港元)，如圖14所示。

此匯聚，超越財政或商業義務，共同致力於更大的社會福祉，以實現普惠包容與可持續增長。值得注意的是，三大引擎在不同國家和地區的相對地位與互動關係存在顯著差異：在中國，政府以制度供給與資源調度承擔頂層主導功能，企業與社區在政府引導下發揮協同作用，形成以政府為主軸的多主體組合格局；而在印尼、沙特阿拉伯、阿聯酋等國家，信仰驅動型公益慈善以共同價值觀凝聚民眾；至於公益慈善生態系統為社區／社群主導型的國家和地區，其公益慈善生態具有更強的自主性。本報告於後續章節，將進一步闡述公益慈善生態系統能助力國家戰略和優先發展事項的原因及方法：公益慈善模式可增強各引擎之間的協作，建立信任，並使各方都能將其核心能力投入到實現普惠包容與可持續增長的共同目標之中。

圖 2
亞洲公益慈善生態系統是三大引擎共同追求普惠包容與可持續增長願景的縮影



專欄1：

五種公益慈善模式的實證研究

本研究基於亞洲各國家與地區為促進公益慈善資源與能力籌集及分配而制定的政策和方法進行實證分析，歸納出五種公益慈善模式（見圖1）。這些政策和方法已被編修為增長經驗彙編，並在本報告的啟示3中加以討論（總結見圖13），完整概述請參見附件1：亞洲公益慈善模式增長經驗彙編。

如圖2所示，五種公益慈善模式促進並引導來自三大引擎的資源流動。單一公益慈善模式可匯聚多個引擎的資源，形成多元交融的格局。例如，政府主導型公益慈善模式在某些國家或地區可以同時匯聚三大引擎的資源，而社區／社群主導型及信仰驅動型模式則能匯聚社會和市場兩大引擎的資源。

資金來源背後，是由眾多主體構成的網絡，這些參與者秉持不同的理念，引導各自的資金投向，且具備能夠為國家發展提供巨大價值的互補能力

植根本土的參與者及超越資金的發展能力

本土公益慈善生態系統中的資金捐贈，宜理解為一種顯性指標。資金來源背後，是由眾多主體構成的網絡，這些參與者秉持不同的理念，引導各自的資金投向，且具備能夠為國家發展提供巨大價值的互補能力（圖3）。

當審視**社區／社群主導型**及**信仰驅動型**模式的思維方式及能力，例如活躍於基層的農村婦女自助小組或本地信仰團體，會發現這些模式能協助社區自我組織，並匯聚社會資本與資金以解決自身難題，同時提升社區的整體韌性，在自然災害來臨時尤為關鍵。在因面臨財政限制，致使社會保障未能全面覆蓋的國家，最後一公里的本地網絡往往能通過同伴間的贈予和團體支持，編織起第一道安全網。在能力方面，他們對本地需求和挑戰擁有無可比擬的深刻洞察，對政府精準設計項目極具價值，例如有助精準識別扶貧目標，或與地方領袖合作。上述能力價值重大，因為它們能夠協助政府支出更有效、更精準地惠及基層社區，並實現預期成效。

信仰驅動型模式更具有通過共同信仰凝聚人心的優勢。以共同抱持的信念指引公益慈善資本的投向，往往能促成更具凝聚力、目標更一致的社會行動。它們亦具備動員公益慈善資本與私人資本共同投入優先發展事項的能力。伊斯蘭金融及伊斯蘭公益金融便屬其中範例。

企業主導型模式在捐贈時，會注重結合公益慈善的方向與持分者利益，並能夠在資金之上，將其核心優勢，包括產品與服務、技術、智力和人力資本、實體基礎設施、網絡及品牌資產，引入國家戰略及優先事項之中，藉此增強政府能力，促進包容性商業發展。當企業同時以資金與能力支持國家建設時，政府便能獲取市場價格難以輕易獲得的核心能力，這在發展中地區的作用尤為關鍵。

政府主導型模式帶動的捐贈能補充公共預算。憑藉其權威地位，能夠提供體制上的公信力與認受性，以此凝聚和協調各方朝國家優先事項採取集體行動，並打破部門壁壘，促成政府跨部門協作及公私營合作(PPP)。同時，亦可借助覆蓋廣泛的公共基礎設施，包括服務供給系統、行政網絡及實體據點，擴大影響力的深度與廣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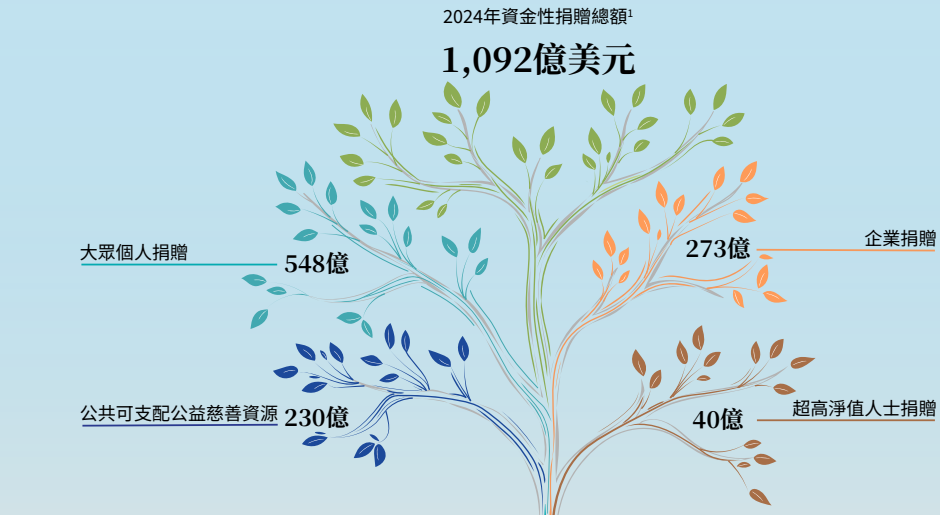
最後，**超高淨值人士主導型**模式同樣能夠帶來企業資源與能力，並善用其關係網絡發揮社會影響力。結合資金捐贈，他們能提供靈活且具耐心的風險資本以鼓勵創新及長期投入，對於主流政策和市場服務未能觸及的小眾議題缺口，尤其具有價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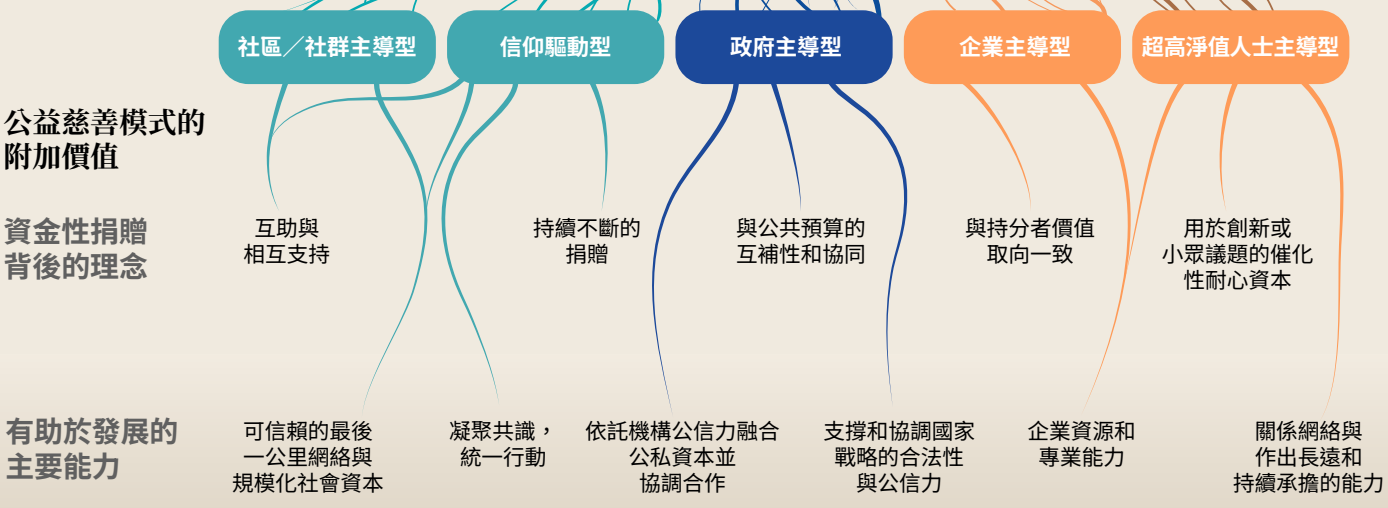
亞洲在多大程度上充分發揮了本土公益慈善生態系統的潛力，以服務最為緊迫的優先發展事項？

當研究計劃審視公益慈善生態系統的全部潛力時，政策問題就變得更加舉足輕重。從能力和優勢的角度理解慈善生態系統後，政策焦點便不應只停留於如何增加捐贈，而應進一步思考如何善用慈善生態系統的資源和力量，共同推進國家發展目標及優先事項，提升整體社會效益。

各國家與地區需結合自身情況作出回應。審視資金性捐贈來源，可助初步了解各國家與地區公益慈善生態系統能夠為國家發展帶來的資源與能力，而由此可掌握背後的參與者構成與公益慈善模式。研究計劃對四大公益慈善資金來源的規模數據已進行初步估算（圖4）。如需進一步了解數據解讀方式及量化方法，請參閱專欄2和3及附件2：量化方法，各國家與地區估算和建議。

圖 3
超越資金：優先發展事項背後的多元參與者及其深厚的能力根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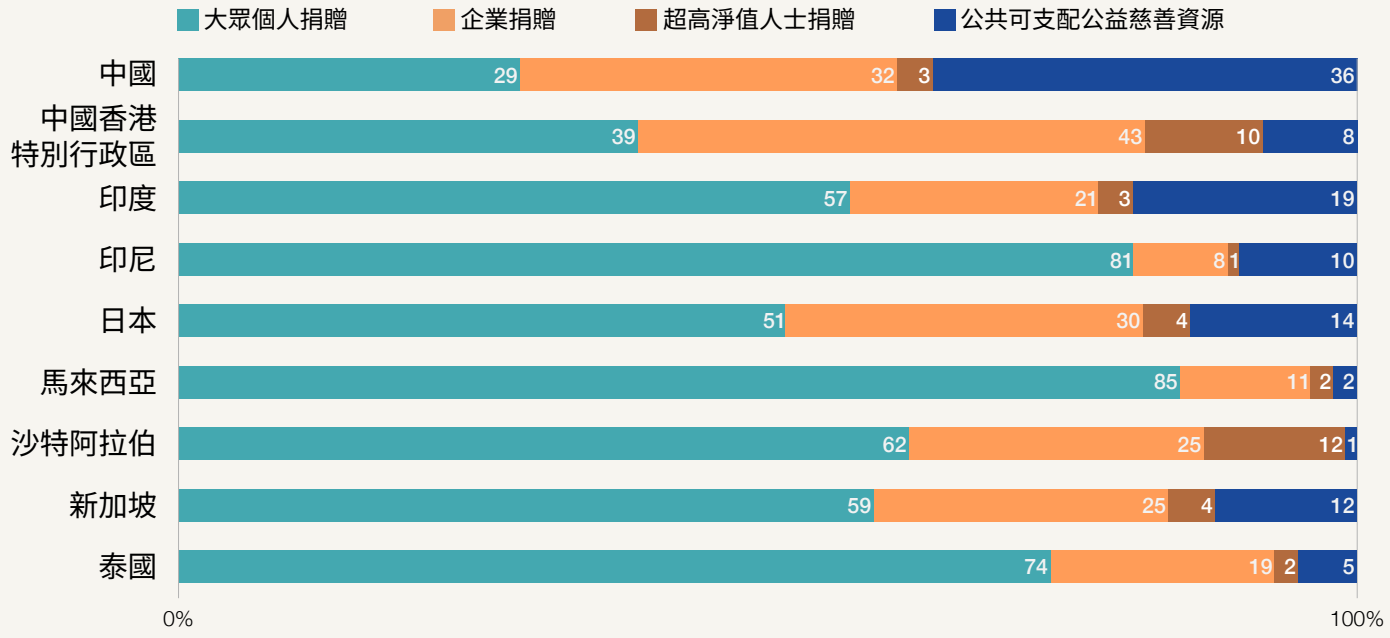
1. 有關方法論和資料來源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附件2。

圖 4
研究計劃估算各國家與地區2024年本土資金捐贈規模

按捐贈來源及國家和地區劃分的本土公益慈善捐贈總額
2024，億美元[1]

合作機構所在國家和地區	社會引擎	市場引擎		政府引擎	捐贈總額(億美元)
	大眾個人	企業	超高淨值人士	公共可支配公益慈善資源[2]	
總額 %	**50%**	**25%**	**4%**	**21%**	**100%**
$	**548[3]**	**273**	**40**	**230**	**1,092[3]**
中國[4]	41–209[5]	137*	11	155	**343 – 512**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9	9	2	2	**22**
印度	116*	44	6	39	**205**
印尼	126[6]	12*	0.8	16	**155**
日本	31* – 50[7]	24*	3	11	**70 – 89**
馬來西亞	9 – 21[8]	2*	0.3	0.3	**11 – 23**
沙特阿拉伯	74	30*	14	1	**120**
新加坡	22*	9*	1	4	**36**
泰國	22*	6*	0.5	1	**29**
阿聯酋[9]	待定	9	待定	待定	待定

按捐贈來源及國家和地區劃分的本土公益慈善資金構成
2024，佔總計的百分比[1]



注：*當現金捐贈無法被可靠地拆分統計時，該數值可能包含部分實物捐贈和企業能力的貨幣化估值。由於缺乏全面的數據以及各國家和地區之間缺乏標準化的估值方法，實物捐贈未被納入量化估算。1. 由於四捨五入，總計與各項之合可能不相等。圖4中的數據聚焦於本土捐贈，因此不包括跨境捐贈，而後者在某些國家和地區的公益慈善版圖中可能占據重要地位，例如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日本、新加坡和阿聯酋；2. 包含基於公共可支配公益慈善資源定義的資金組成部分(詳見附件2)；3. 總額取自區間中值；4. 僅包含中國內地的數據。截至本中期報告發布時，民政部2024年的正式大眾個人捐贈和企業捐贈數據尚未公布，待官方數據發布後將予以更新；5. 下限範圍包括基於《中國慈善捐贈》的正式捐按捐贈來源及國家和地區劃分的本土公益慈善捐贈總額贈和可追溯的通過數字平台的非正式捐贈，上限範圍包括基於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調查數據估算的大眾非正式捐贈；6. 該數值包含2%未分類捐贈，其中可能包含實物捐贈。大部分實物捐贈未被納入測算；7. 區間範圍基於兩個數據來源：日本統計局進行的家庭收入和支出調查，以及日本籌款協會發布的《日本慈善捐贈》(《Giving Japan》)(詳見附件 2)；8. 下限範圍包括馬來西亞各州伊斯蘭宗教理事會和Yayasan Waqaf Malaysia機構收集的個人天課和瓦克夫(waqf)數據，上限範圍包括基於慈善援助基金會調查數據和官方收入數據估算的非正式捐贈及非基於伊斯蘭信仰的正式捐贈；9. 本研究計劃合作機構Erth Zayed Philanthropies已召集阿聯酋公益慈善生態系統中本地和聯邦利益相關方，共同測算本土捐贈總額。國家企業社會責任基金Majra提供的2024年數據已反映在本表中，詳情見附件2。阿聯酋企業捐贈數據未包含在捐贈總額中。

專欄2：

解讀公益慈善規模估算數據

圖4中數據為亞洲本土捐贈規模與廣度的首次估算。研究計劃所覆蓋的各國家與地區合計佔亞洲人口的70%和本地生產總值（GDP）的80%。[註14]量化公益慈善資源時，研究計劃僅計算各引擎每年新注入生態系統的資源，以避免資源在抵達最終目的地前，因途經多個主體而被重複計算。

這些估算宜理解為反映各國家與地區公益慈善生態系統中資金捐贈規模與構成的指標。藉此可見何種捐贈來源較為活躍，從而反映五種公益慈善模式在該國家或地區發揮作用的比重。在首輪研究中，各國家與地區的數據項目未必完全可比，相關方法論原因已在附件2中詳盡說明。

附件2還提供公益慈善生態系統中資產收益的額外量化估算（適用於有相關數據的國家和地區）——此類收入並非新增資金（例如來自慈善基金及／或宗教捐贈基金的資產收益），同時涵蓋義務工作時數的估算，用以衡量亞洲各地民眾廣泛參與公民活動的程度。

14 本報告依據聯合國統計司（UNSD）的M49區域分類界定亞洲範圍。估算基於以下來源：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24; and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GDP Based on PPP, Share of World.”

專欄3：

建立可比較的數據標準與框架

研究計劃的研究方法是對可用本地數據源進行深入的、自下而上的梳理，並嚴格評估數據的質量、全面性與時效性。在條件允許下，以當地政府官方數據為首選；其他數據源則須來源清晰、方法透明，方會採用。數據來源與推演方法因國家和地區而異，均基於當地可獲得的最佳數據及政府的相關指引。

整體數據透明度尚有顯著的改善空間。研究計劃就此向有意改善數據透明度的國家和地區，有以下實務建議(詳情請參閱附件2)：



大眾個人捐贈。正式個人捐款資料通常較容易從公益慈善組織的受捐記錄或稅務部門取得。對於非正式捐贈，建議將相關問題作為支出項目納入人口普查，以識別個人的非正式捐贈行為，從而有效減少獨立問卷調查可能帶來的社會期望偏差及抽樣誤差。我們基於可用資料來源限制，與當地專家諮詢後採用了最適宜的估算方法。



企業捐贈。根據當地政策框架，例如企業社會責任(CSR)報告和／或稅務部門記錄，往往能提供最為準確的數據。其次可採用能夠明確區分企業捐贈的受捐機構數據。大多數國家和地區至少具備上述其中一種數據來源。僅有兩個地區以本地抽樣數據進行估算。

超高淨值人士捐贈。人口普查數據與稅務數據能夠可靠地將超高淨值人士捐贈與大眾個人捐贈或企業捐贈加以區分，從而避免重複計算。專門為超高淨值人士捐贈設計的平台是極具潛力的替代方案，可提供可靠數據，但這取決於覆蓋範圍的大小。自下而上地匯總並驗證超高淨值人士的捐贈數據是另一替代方案，然而，當捐贈者刻意保持低調，該方法可能會導致估算偏低。目前有三個國家擁有本地數據支持，其餘國家和地區則採用捐贈—資產基準比例，並結合本地資產數據進行推算。



公共可支配公益慈善資源。該數據是在當地合作機構和專家的指導下，自下而上整理而成。今後，各方可按照研究計劃的定義進行跨部門評估，以得出更全面的估算數據。

啟示二：

重新構想公益慈善潛力



亞洲公益慈善生態系統有助提升國家推動發展目標的能力

放眼亞洲，各國家與地區正為實現未來二十年普惠包容與可持續增長的共同抱負而積極推進其國家願景。儘管這些願景植根於不同的政治體制與文化背景下，卻擁有共同的核心共識：需要賦能基層社區／社群，並促使三大引擎以更協調、更高效的方式協同發力，共同服務於實現普惠包容與可持續增長的國家戰略。

圖5
國家願景強調全社會攜手並進

中國致力於到本世紀中葉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實現。為此，中國提出將「三次分配」作為實現共同富裕的組成部分：初次分配由市場主導，再分配由政府主導，第三次分配則依靠社會力量在公益慈善領域的投入。這將鼓勵企業、社會組織與個人積極參與公益慈善事業。[1]

印度的「發達印度2047願景」強調包容性發展，其核心聚焦於青年、貧困家庭、婦女和農民，認為上述群體的賦能與進步是印度發展的關鍵所在。[2]

印尼的「黃金印尼2045願景」將社區層面中小微企業與合作社視為經濟轉型的關鍵。其着重指出，優化社會文化資本是增強個人、家庭、社區和環境韌性的關鍵任務。[3]

沙特阿拉伯的「2030願景」明確提出目標，將非營利部門對GDP的貢獻提升至5%，足見當局對社會引擎推動發展的角色高度重視。[4]

1. 習近平，《扎實推動共同富裕》，求是，2021；《如何理解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制度體系》，二十大學習輔導百問，北京，黨建讀物出版社和學習出版社，2022。
2. 《印度總統Droupadi Murmu閣下議會發言》。
3. 《2024年第59號法律》。
4. 沙特阿拉伯，《2030願景》，2026年5月最後訪問。

公益慈善生態系統能夠支持政府有效賦能社會引擎，並完善三大引擎之間的協同機制

信任與統籌協調是合作的根本，一個建全的協同機制，包括制度、機制、慣例與渠道，可以鞏固互信，並促使三大引擎中多元參與方圍繞共同使命有效協作。公益慈善生態系統能夠支持政府有效賦能社會引擎，並完善三大引擎之間的協同機制。本報告指出，協同機制可透過三個界面改善各引擎參與者之間的協作：政府與社會界面、政府與市場界面，以及社會與市場界面。

下文將詳細闡述研究計劃中兩個最大成員 —— 中國和印度 —— 推動建設協同機制以服務國家戰略的兩個長期案例，以及公益慈善生態系統在其中發揮的作用。

中國的脫貧攻堅戰

當政府與社會有效合作時，項目需要依靠緊貼社區的最後一公里網絡提供資訊，實現更完善的設計、更精準的定位和更有效的推行。當政府與市場緊密配合時，私人投資與專業能力便能專注投放在發展中地區。當市場與社會攜手共創，企業就能通過經當地社區推行、調整並實證成效的模式，推動更具包容性的增長。

中國的脫貧攻堅戰，正是上述大規模協作的典範。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及國家戰略主導下，2013年至2020年間，中國帶領9,899萬農村絕對貧困人口脫貧，提前十年達成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減貧目標。[註15]國家建立「五級書記抓扶貧」的責任體系，通過向貧困村派駐超過25.5萬個駐村工作隊、總計逾300萬名幹部，將管理人才、政策知識和外部人脈網絡注入基層，從而提升貧困社區的發展能力。[註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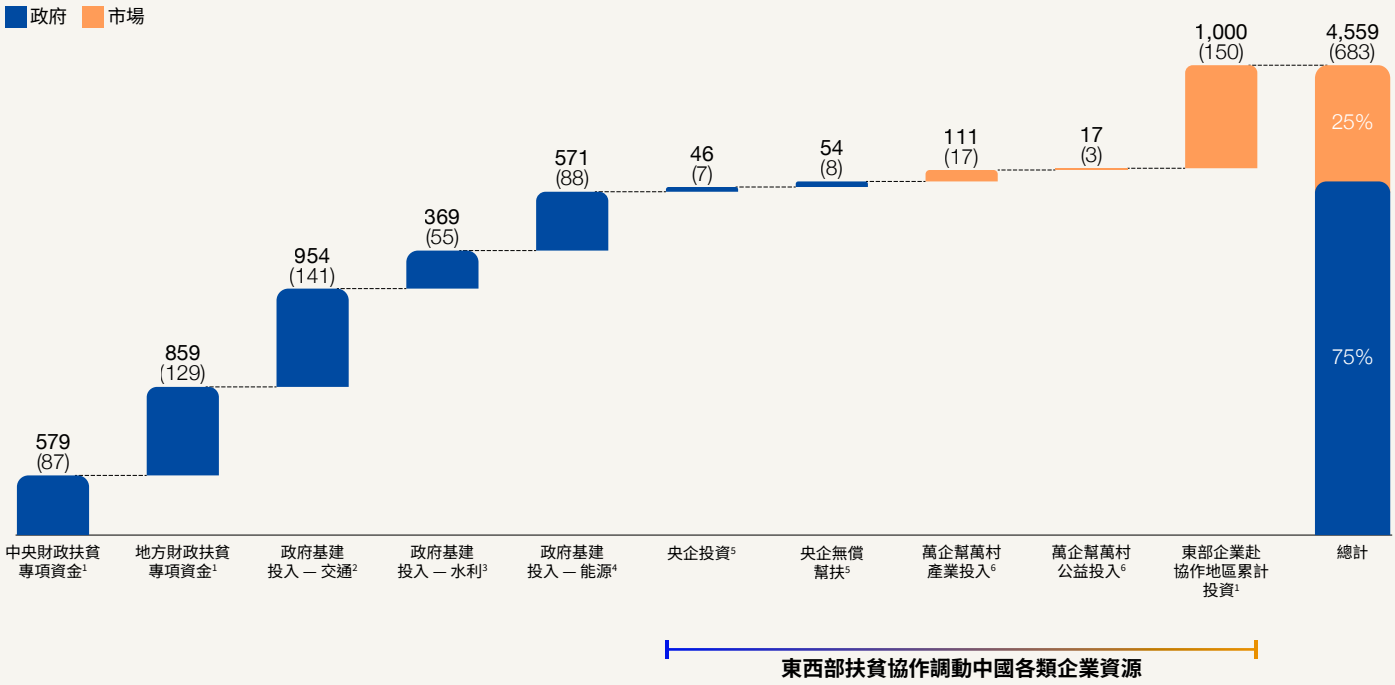
同時，政府亦在政府與市場的界面處構建了堅實的協同機制。東西部扶貧協作（1996年中共中央作出東西部扶貧協作戰略部署，2021年更名為東西部協作）便是當中典範——它在東部較發達地

15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人類減貧的中國實踐》白皮書。
16 在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上的講話，北京，2021年2月25日，新華社。

區的資本與能力和中西部573個貧困縣之間，架起信任的橋樑（見圖6）。[註 17]在此番協作中，政府統籌協調，通過互訪、聯席會議、對接交流等方式，立足中西部所需，東部所能，將東部投資和公益慈善資源有的放矢地引入中西部。[註 18]中央企業率先垂範，合共貢獻逾1,000億人民幣（約153億美元，1,193億港元），當中460億人民幣（約70億美元，546億港元）為直接投資，540億人民幣（約83億美元，647億港元）為無償幫扶資金，另外累計購買貧困地區農產品140多億人民幣（約21億美元，164億港元）。[註 19]其他東部地區企業赴扶貧協作地區累計投資逾1萬億人民幣（約1,497億美元，1.17萬億港元）。[註 20]

圖6
東西部扶貧協作作為中國脫貧攻堅國家戰略的協同機制

2015-2020年脫貧攻堅支出概略估算*
[人民幣，十億（美元，十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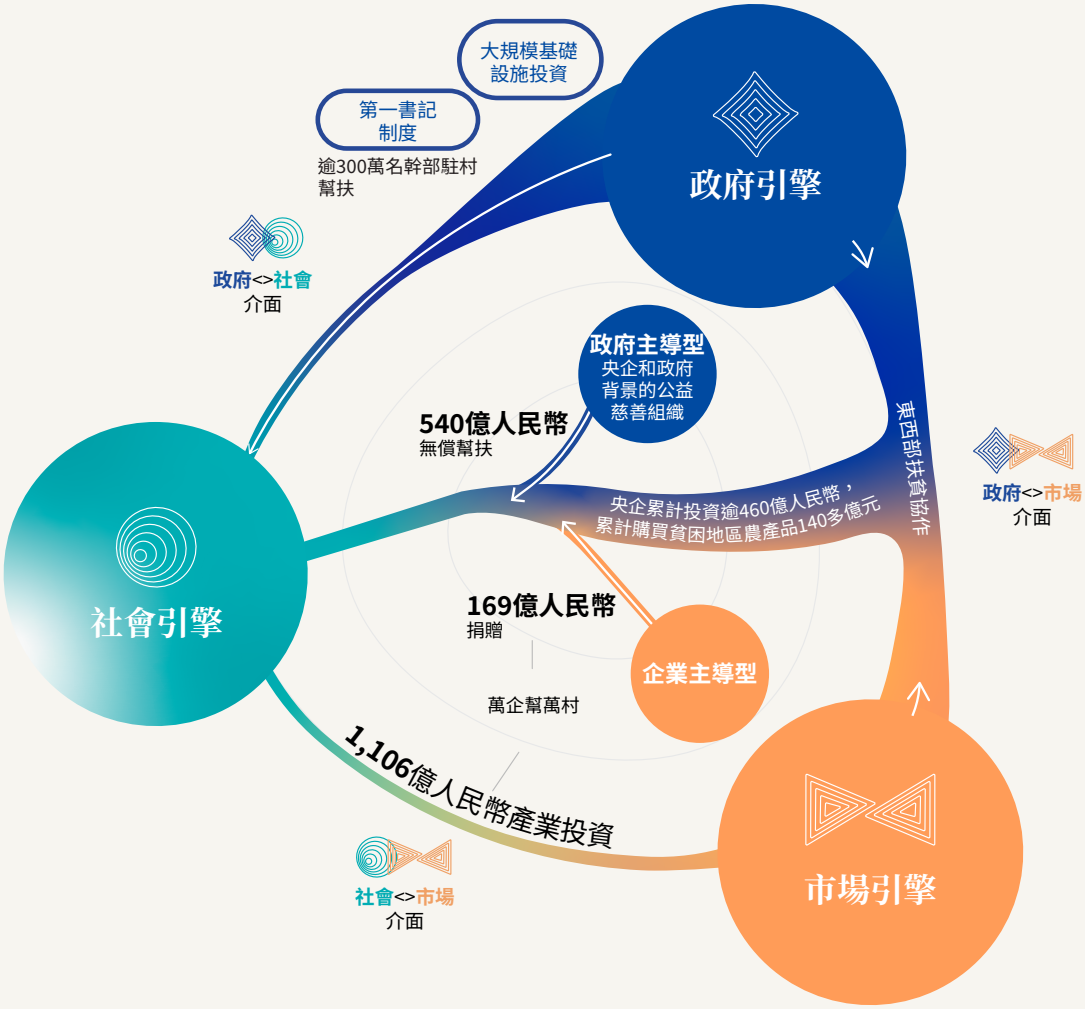
注：*以習近平總書記2013年首次提出精準扶貧為起點，中國扶貧開發進入脫貧攻堅新階段。中共中央、國務院於2015年發佈《關於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因此研究計劃盡可能採用2015至2020年間的數據。三項數據來源僅涵蓋不同時段，研究計劃為保證估算的準確性，故直接納入，當中包括央企投資與無償幫扶（2013-2020年），以及政府在交通（2016-2020年）、水利（2016-2020年）和能源（2012-2019年）方面的基礎設施投資。圖中數據為中國扶貧領域投資的粗略估算，涵蓋已收集到的主要支出類別，未盡涵蓋所有範疇。

數據來源：1.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人類減貧的中國實踐》白皮書，新華社，2021年4月6日；2. 王紫、連品潔，「交通運輸部：「十三五」期貧困地區公路建設工程累計完成投資9538億元」，人民網，2020年10月22日；3.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國新辦舉行水利支撐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新聞發佈會」，2021年9月9日；4. 國家能源局，「國新辦舉行能源行業決戰決勝脫貧攻堅有關情況發佈會」，國家能源局，2020年10月19日；5. 國務院國資委黨委，《在脫貧攻堅中彰顯國資央企使命擔當》，《求是》2021年第4期；6. 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全國工商聯發佈〈中國民營企業社會責任報告（2021）〉》，2021年12月23日。

17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人類減貧的中國實踐》白皮書。
18 甘肅省人民政府，《全省東西部協作與中央單位定點幫扶記者會實錄（文+圖）》，每日甘肅網，2026年7月27日。
19 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黨委，《在脫貧攻堅中彰顯國資央企使命擔當》，求是，2021年第4期。
20《人類減貧的中國實踐》白皮書。

在此階段，中國的公益慈善生態系統在中國政府的領導下，緊密配合國家戰略，政府主導型與企業主導型公益慈善在擴大東西部扶貧協作機制在最後一公里的影響力，發揮重要的協同作用。例如中國光彩事業促進會與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中華全國工商聯合會共同發起「萬企幫萬村」行動，動員民營企業家精準扶貧。截至2020年底，共有12.7萬家民營企業參與其中，產業投資達1,105.9億人民幣（約166億美元，1,295億港元），投入公益慈善項目的資金達168.6億人民幣（約25億美元，195億港元），共同惠及超過1,800萬貧困人口。[註 21]此舉生動體現中國「黨委領導、政府負責、民主協商、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撐」的社會治理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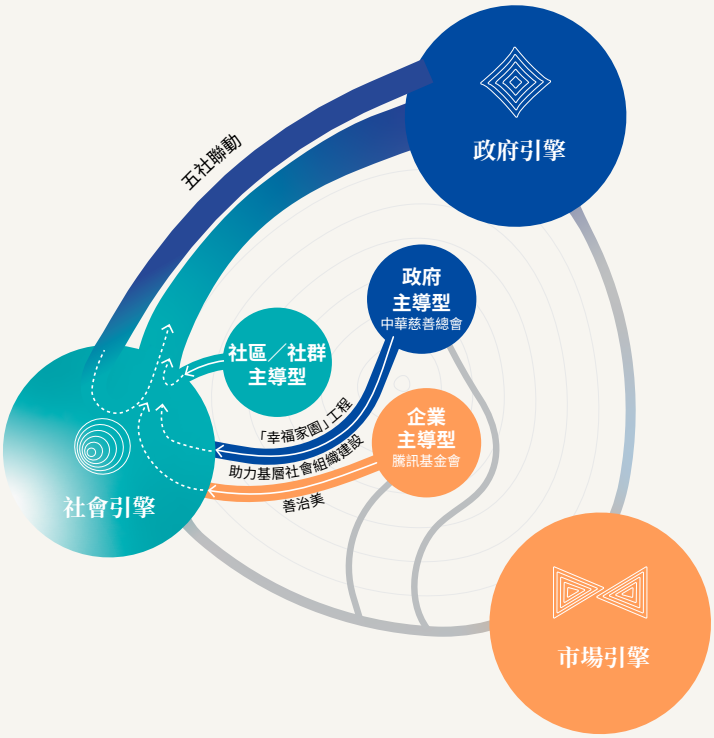
圖7
脫貧攻堅（2013-2020）：公益慈善生態系統助力國家戰略推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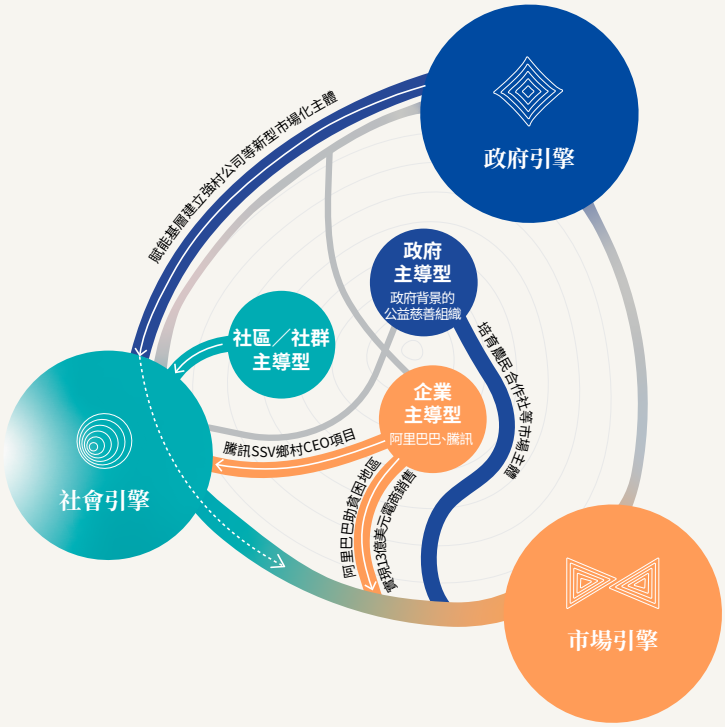
* 所列示例僅為部分典型案例，旨在說明公益慈善所發揮的作用

21 全國工商聯發布《中國民營企業社會責任報告（2021）》，2021年12月21日。

圖 8
鄉村振興(自2021):
強化社會與政府協作機制



強化社會與市場協作機制



從脫貧攻堅邁向鄉村振興(2021年至今)

伴隨絕對貧困的全面消除，自2021年起，國家工作重心正式轉向全面推進鄉村振興，以達致包容性增長。[註22]此項戰略更為複雜，須在多個維度提升，涵蓋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政府確切認識到，基層社區需要在黨和政府的引導下更有效地組織起來，從而具備理解自身需求，並在制度框架內有序參與治理的能力。唯有如此，社會引擎才能應對這種更高的複雜性，並改善其與政府及市場之間的互動。

在此階段，中國的公益慈善生態系統更加活躍。企業主導型模式將其核心資源和能力傾注於增強協作機制，從而助力國家戰略達至規模化影響(圖8)。

在政府與社會界面，加強社會引擎並促進社區與地方政府之間的有效溝通至關重要，使社區能夠在制度框架內參與公共事務，並向政府精準反饋本地的訴求與挑戰。順應政府「五社聯動」(社區、社會組織、社會工作者、社區志願者、社會公益慈善資源的聯動)的方針，「善治美」平台成為企業主導型公益慈善發揮輔助作用的生動範例。

22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人類減貧的中國實踐》白皮書。

在農業農村部主導下，騰訊公益慈善基金會利用其技術能力成功開發此數碼平台，目前已覆蓋8.2萬個行政村，服務1,600萬村民。[註 23]該平台使得村民能夠提出問題、參與集體決策，並實時追蹤政府及其他社會組織的跟進情況。以四川省為例，該平台將村級事務處理時間縮短65%，重複性行政任務減少40%，公眾滿意度提升至92.3%。[註 24]

在社會與市場界面，強村公司等新型市場化主體與農民專業合作社提高了農村社區參與市場活動的商業可行性，並保障農村發展的可持續性。中國鄉村發展基金會作為政府背景的公益慈善組織，在全國17個省的50個村莊培育更具實力的合作社。[註 25]騰訊可持續社會價值事業部則聚焦於培養鄉村CEO以發展鄉村經濟。阿里巴巴向全國12個省、29個欠發達縣派出鄉村特派員，協助當地鄉村與政府物色及生產本地農產品，並依託阿里電商平台推動產品大規模銷售，累計開展逾110個項目，帶動駐地縣域銷售額突破90億人民幣(約13億美元，101億港元)(見圖8)。[註 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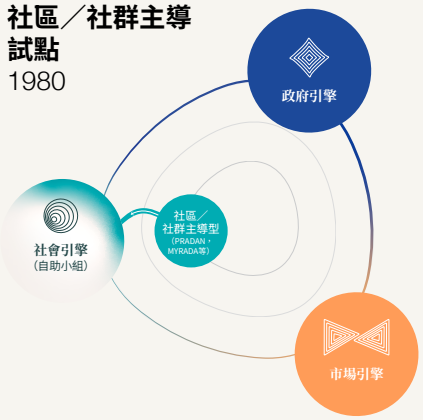
23 騰訊可持續社會價值事業部，「為村發展實驗室」，2026年7月訪問。
24 張彧希，「川善治」平台入選全國典型案例，四川日報，2026年3月10日。
25 中國鄉村發展基金會，《百美村莊計劃2025年度總結報告》，中國鄉村發展基金會，2025年12月。
26 楊陽，《阿里巴巴入選中國民營企業社會責任優秀案例》，餘杭時報，2025年12月25日。

印度的鄉村生計改善

印度長期推進農村發展的歷程，生動展現其公益慈善生態系統，尤其是社區／社群主導型公益慈善及政府主導型公益慈善，如何在強化社會引擎，以及促進社會、政府與市場之間的協作機制方面發揮關鍵作用，從而推動農村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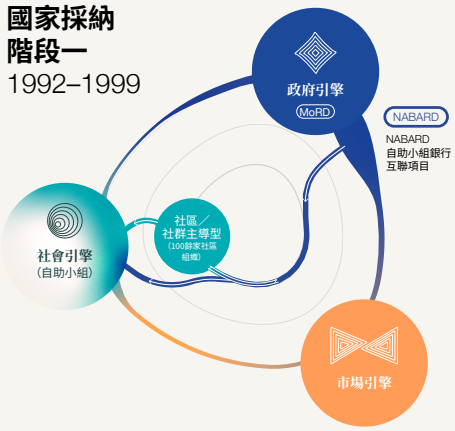
圖 9

社區／社群主導試點
1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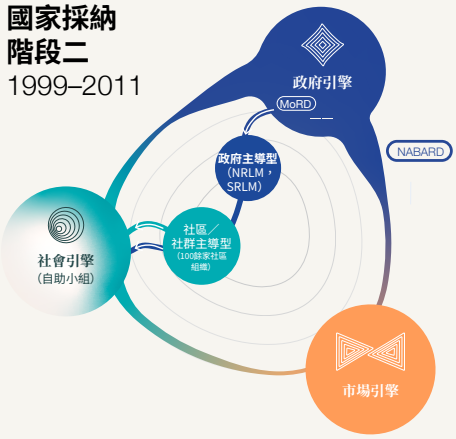
20世紀80年代，以邁索爾安置與發展機構(Mysore Resettlement and Development Agency, MYRADA)及專業援助促進發展行動(Professional Assistance for Development Action, PRADAN)為代表的社區主導型公益慈善組織，將農村貧困婦女組織成自助小組(SHGs)，初期以非正式儲蓄信貸組織形式運作，證明農村婦女即使獲得較少外部支援，仍能維持儲蓄紀律、償還貸款，並有效自我管理。(註 27)

國家採納階段一
1992–1999



1992年，在數百家社區組織的緊密配合下，印度政府通過國家農業和農村發展銀行(National Bank for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NABARD，隸屬於財政部的公營銀行)採納此模式，使農村婦女藉著可獲銀行信貸的身份，得以躋身主流群體。(註 28)

國家採納階段二
1999–2011



1999年，該項目管理權移交至農村發展部(Ministry of Rural Development，MoRD)，更加注重減貧並將模式向全國推廣。(註 29)到21世紀初，已有數百萬農村婦女加入自助小組。2011年，農村發展部設立國家農村生計發展計劃(NRLM)和相應的邦農村生計發展計劃(SRLM)，作為具有獨立授權的自治實體，以繼續加強及擴大該計劃。到2025年，印度共有1.005億名農村婦女被組織到909萬個自助小組中，覆蓋至少一半的農村家庭。(註30)(註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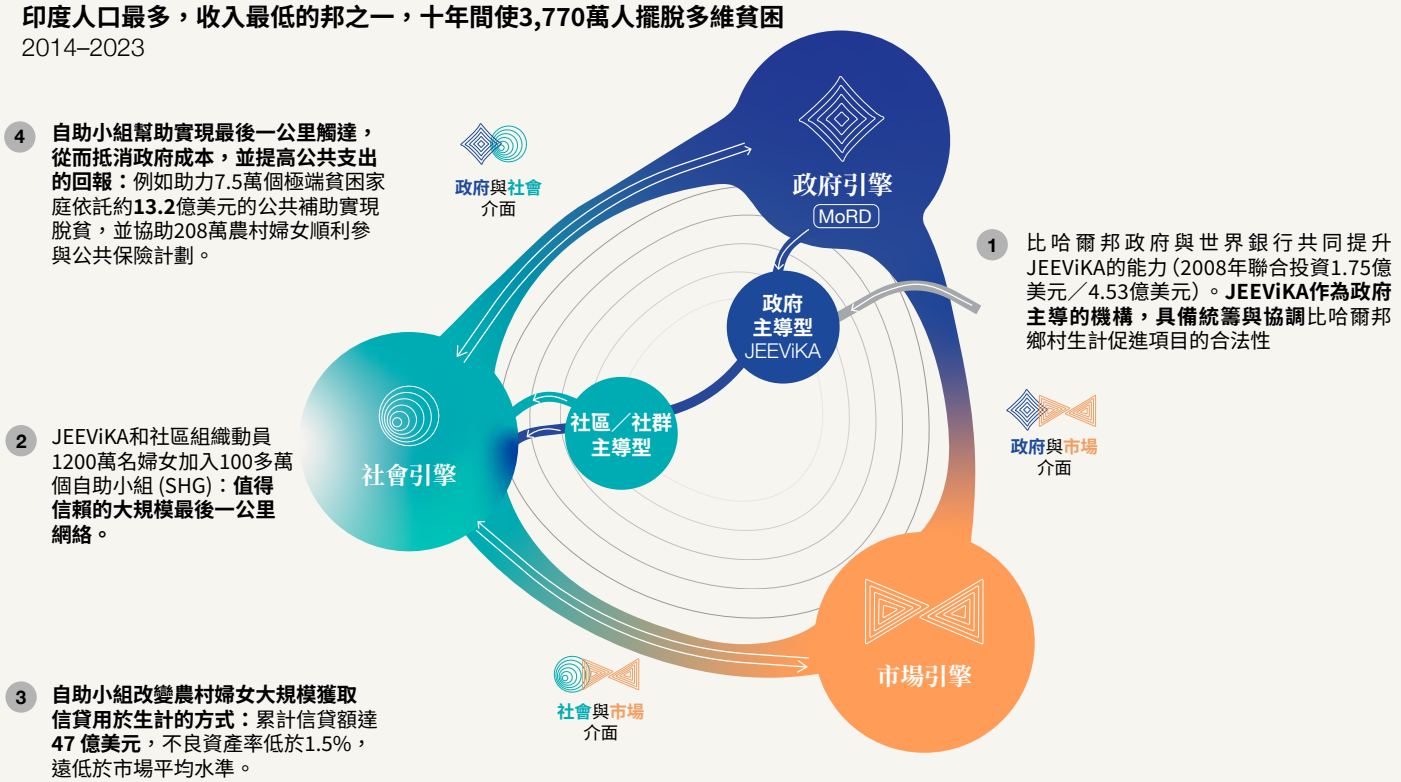
27 Ajay Tankha, *Banking on Self-Help Groups: Twenty Years On*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2012), 11-13.
28 Tankha, *Banking on Self-Help Groups*, 11-13.
29 Government of India, Ministry of Rural Development, "National Rural Livelihoods Mission: Another Step towards Poverty Alleviation," *Press Information Bureau*, June 1, 2011.
30 Government of India, Ministry of Rural Development, "Target Achieved under Deendayal Antyodaya Yojana – National Rural Livelihoods Mission," *Press Information Bureau*, March 18, 2025.
31 Government of India, Ministry of Rural Development, "SECC 2011 at a Glance," *Socio Economic and Caste Census (SECC) 2011*, 2026年7月訪問.

在探討公益慈善生態系統重塑協作機制的方法時，印度收入最低且人口最多的邦之一 —— 比哈爾邦，為此提供了值得深思的案例（圖10）。[註32] 2014年至2023年期間，該邦約有3,800萬人成功擺脫多維貧困。[註33] 政府主導型與社區／社群主導型公益慈善組織共同致力於賦能社會引擎，在2008至2020年間將超過1,200萬農村婦女及家庭成員納入100多萬個自助小組。具政府背景的比哈爾邦農村生計促進協會（JEEViKA）憑藉其公信力及認受性，為這項任務奠定穩固基礎，並發揮核心的協調作用。比哈爾邦農村生計促進協會通過比哈爾邦政府的1.75億美元（約13.65億港元）及世界銀行4.53億美元（約35.33億港元）的聯合投資來建立其核心能力，當中世界銀行亦提供技術援助與專家智慧。[註34]

自助小組大規模促進普及金融（financial inclusion），重塑社會與市場的協作機制，並促成累計達3,900億盧比（約47億美元，366.6億港元）的信貸資金用於改善生計，同時將不良資產比率維持在1.5%以下，遠低於市場平均水平。與此同時，自助小組亦透過提升公共服務的交付效能及抵銷政府開支，重塑社會與政府的協作機制，協助7.5萬個極端貧困家庭依托1,100億盧比（約13.2億美元，102.96億港元）的公共補助實現脫貧，並推動208萬農村婦女順利納入公共保險計劃。[註35]

圖 10
印度 —— 比哈爾邦農村生計促進項目（邦發展戰略）

印度人口最多，收入最低的邦之一，十年間使3,770萬人擺脫多維貧困
2014–2023



32 在印度各地，有許多例子表明，透過自助小組加強農村家庭社區建設，可以產生大規模的影響。我們在附件1中對此進行了更詳細的描述。
33 Government of India,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 India Reduced Significantly; 24.82 Crore People Escaped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between 2013-14 and 2022-23," *Press Information Bureau*, January 15, 2024.
34 World Bank Group, "Unleashing the Power of Women's Collectives".
35 Bihar Rural Livelihoods Promotion Society (JEEViKA), *Annual Action Plan and Budget FY 2024–25* (Patna: BRLPS, 20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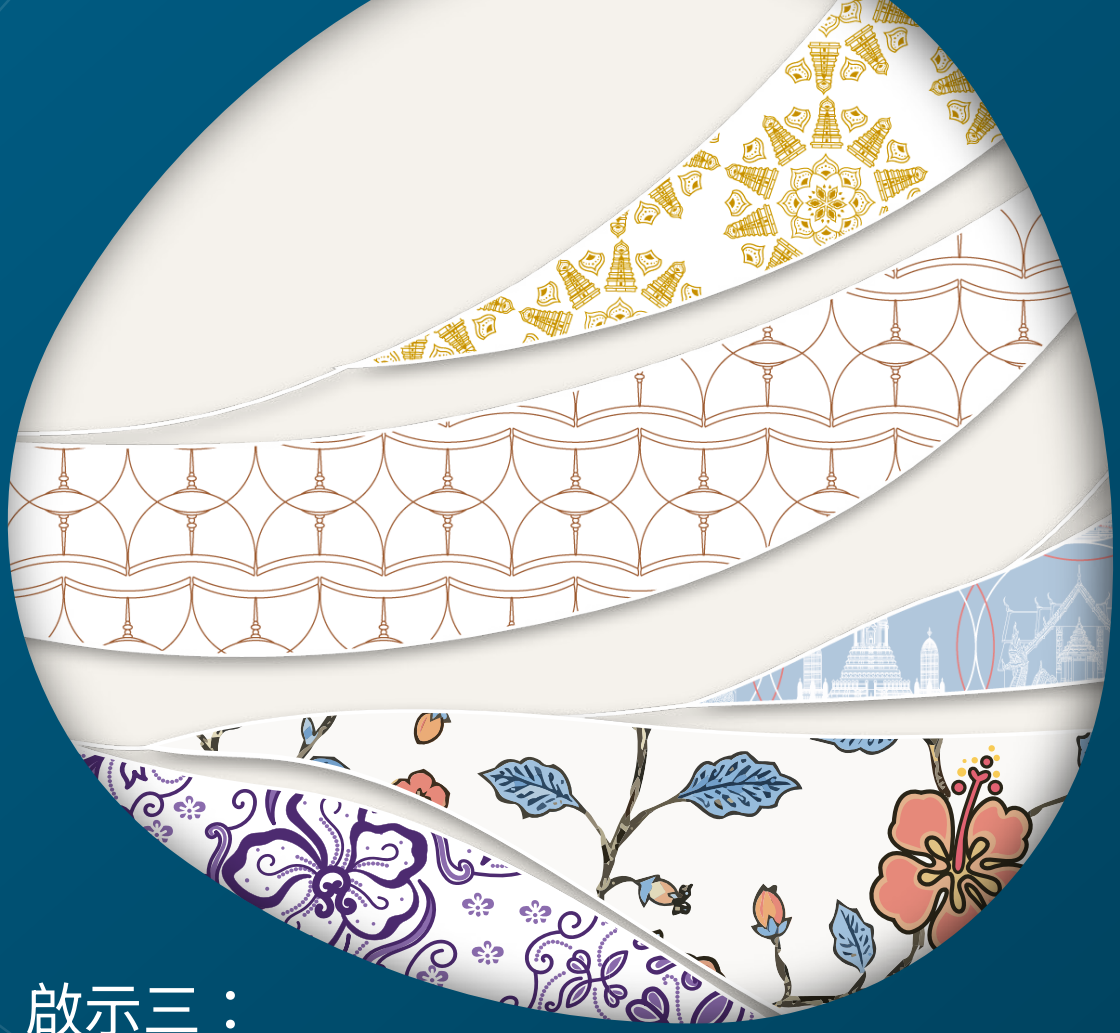
公益慈善生態系統及強大的社會引擎為何對印度公共財政預算具有重要意義

對於承擔發展職能的政府部門而言，公益慈善生態系統與強大的社會引擎的一大貢獻，在於讓公共預算更有效地達到預期成果，並惠及其所服務的人群。這種作用體現於三方面：其一，組織化的社區／社群網絡能提升公共服務項目的精準定向與推行成效，減少資源流失，提高財政支出的回報率；其二，社區／社群網絡可將觸角延伸至公共服務體系難以低成本覆蓋的地區和家庭，降低政府在服務過程中產生的單位成本，並增強項目在當地的公信力和接受度；其三，社區／社群主導型的資金資源與社會資本能為政府項目分散試驗探索中的不確定性風險，並提升項目成功機率。

中國和印度的案例，闡明不同公益慈善模式能夠如何完善政府、市場與社會之間的協作機制，從而推動三大引擎更有效地協同運作，共同服務於促進普惠包容及可持續增長的國家戰略（圖 11）。放眼亞洲，國家戰略的涵蓋範圍遠不止減貧和農村或區域振興，亦包括：應對快速老齡化的人口結構變化、人工智能時代的技能培訓及終身學習體系建設，以及氣候和能源轉型等重大議題。

圖 11
公益慈善模式在國家戰略中所扮演的部分角色示例（並不盡列）

	公益慈善模式：特定參與者	超越資金捐贈的核心能力	在強化社會引擎和引擎間協同機制方面所發揮的作用
中國案例	**政府主導型：**中華慈善總會，中國光彩事業促進會，中國鄉村發展基金會	協調國家任務和優先事項的合法權威	資源動員者 規模化協調者
	企業主導型：騰訊，阿里巴巴	核心資源和能力：數碼化能力、社交媒體平台以及電子商務平台	平台連接者與建設者
印度案例	**政府主導型：**國家農村生計發展計劃 (NRLM) 邦農村生計發展計劃 (SRLMs)	協調國家任務和優先事項的合法權威	國家使命重要力量與協調者 資源動員者 規模化協調者 本地化執行者
	社區／社群主導型：PRADAN，MYRADA及逾百家其他社區組織	大規模最後一公里網絡和社會資本	創新者／模式構建者 受信賴的實施者



啟示三：

攜手共建未來十年

公益慈善生態系統需要策略性投資，方能成為推動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而亞洲各地的經驗分享則可以加快進程。

為充分發揮慈善生態系統的作用，需在三個關鍵範疇加強本地資源投入。本文的建議屬研究計劃的階段性建議，未來一年將透過與政策制定者及決策者進一步交流，完善建議內容，並於2027年發布最終報告及行動路線圖。

投資一：提升數據可見度

更佳的數據可見度有助於各國與地區掌握其公益慈善生態系統，能為發展提供的資源與能力，進而推動更具深度的政策探討與決策。

通用的分類方法、數據標準和方法論可以幫助各國家與地區提升協作效率，避免重複投入資源，相關詳細討論請參見附件2。

提高可見度有助於更好運用國內資源以服務於國家優先事項。例如，資金性捐贈中一個常被低估或較不引人注意的來源是大眾個人捐贈，尤其是由社區／社群主導型和信仰驅動型公益慈善模式所推動的非正式日常捐贈。印尼宗教事務部希望提高此類捐贈的可見度，以更深入地理解伊斯蘭公益慈善中非正式捐贈所蘊藏的潛力。為此，研究計劃支持該事務部開展20年來的首次全國性公眾調查（見圖12）。[註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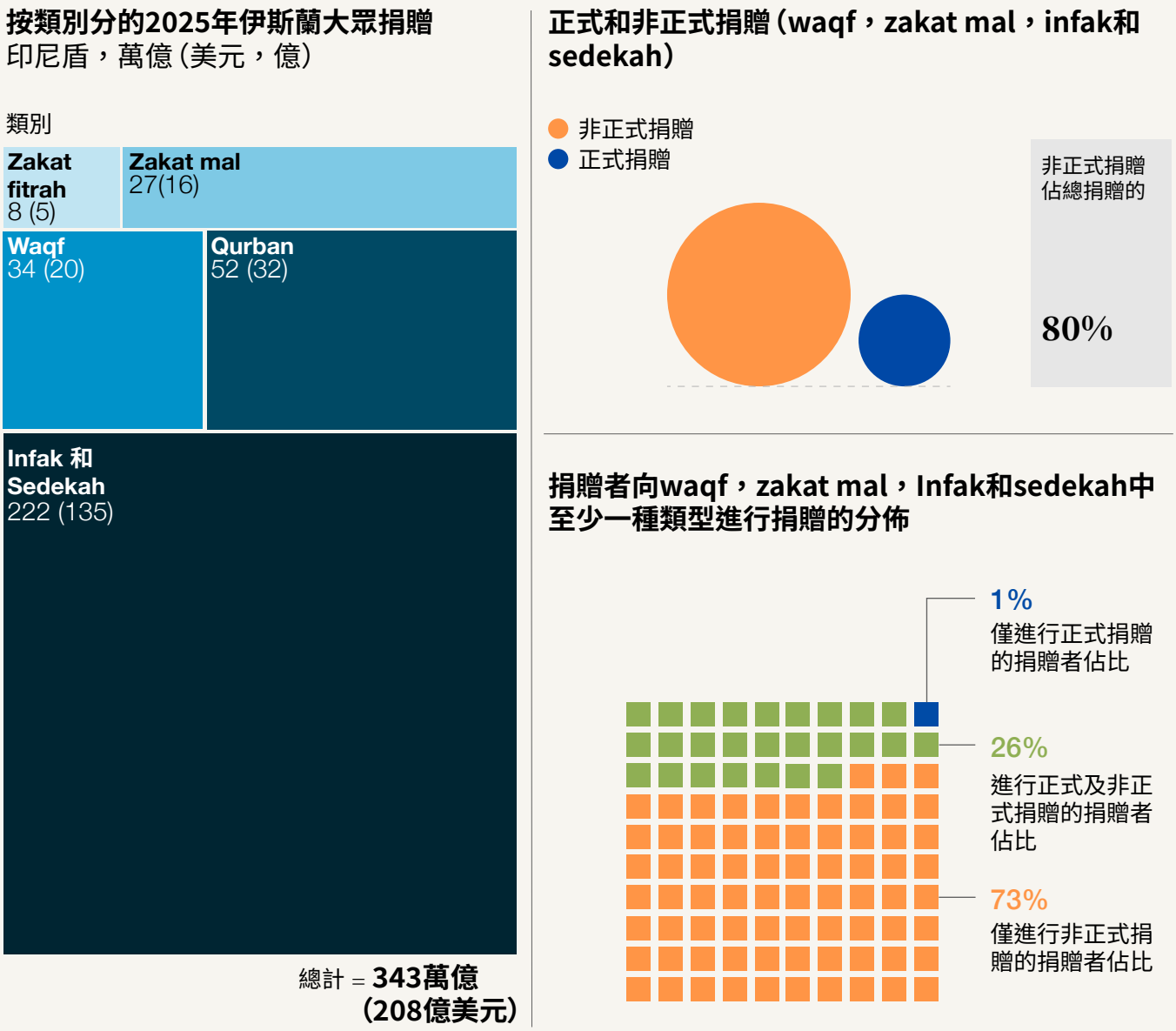
調查結果揭示伊斯蘭公益慈善日常捐贈的龐大規模：年度總額高達343萬億印尼盾（約208億美元，1,622.4億港元），涵蓋貨幣和實物捐贈。[註37]其中非正式捐贈約佔總額的80%（約167億美元，1,302.6億港元）。該調查就如何善用國內資源以配合扶貧等國家策略，提出了關鍵的問題。根據伊斯蘭教義，天課（zakat mal，

36 Commission on Asian Philanthropy, Ministry of Religious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Indonesia, and Social Trust Fund UIN Syarif Hidayatullah Jakarta, *National Public Survey for Islamic Philanthropy*, unpublished survey dataset, data collected January–February 2026 (covering 2025 data).

37 總額與量化估算中的大眾個人捐贈數字（圖4）有所不同，因為實物捐贈（估計價值134.5萬億印尼盧比，約82億美元，約639.6億港元）被排除在外，剩餘金額進一步按2024年價格水平調整。

對達到特定財富門檻者徵收的年度義務捐贈）旨在用於財富再分配和消除貧困；而自願捐贈和施捨（infak and sedekah）則是靈活的捐贈形式，往往與天課一併管理，並用於相近的用途。這兩種捐贈方式合計每年為國家減貧事業貢獻約151億美元（約1,177.8億港元），幾近政府2026年315億美元（約2,457億港元）社會保障政府預算的50%（這是政府減貧的核心預算類別之一，涵蓋基本生活保障項目和社區賦權計劃）。[註38]

圖 12
印尼全國伊斯蘭公益慈善公眾調查結果，2026



注：總加權樣本量為1.810億，基於8,360的原始樣本量。非正式／正式管道分析使用樣本子集（n=6055），該子集包含足以進行高置信度分析的資訊。

38 Julian Isaac, “Govt Raises 2026 Social Protection Budget, Focusing on Basic Needs, Poverty Reduction,” *Indonesia Business Post*, August 19, 2025.

Waryono Abdul Ghafur教授（宗教事務部Zakat和Waqf賦能總監）表示，上述調查結果印證印尼社會深厚的互助傳統與社會團結文化，這正是推動伊斯蘭公益慈善事業發展的重要社會資本。他指出：

伊斯蘭公益慈善在印尼蘊藏著巨大潛力。未來的核心挑戰，在於如何將此潛力更有效地加以善用，使其在扶貧濟困、社區經濟賦能、教育發展及人道援助計劃中惠及更廣泛的群體。此次調查數據意義重大，有助於推動政府、天課機構、瓦克夫（waqf）機構及各利益相關方形成更緊密的協同合力，提升伊斯蘭公益金融的管理及運用效能。[註39]

提高非貨幣性核心能力捐贈數據的可見度，對各國家與地區同樣具有重要價值。例如，企業運用其核心資源和能力支持優先發展事項時，目前尚無一套標準或方法，衡量捐款及員工志願服務以外其他貢獻的價值。例如，泰國楠府沙盒（Nan Sandbox）項目中，開泰銀行（Kasikornbank）與政府合作，運用其商業網絡、企業營運能力及高級管理人才，構建涵蓋包容性醫療保健、青年賦能，以及「醫藥—農林業端到端價值鏈」的綜合性本地化模式，藉此持續改善民生並保育森林。

最後，對於信仰驅動型公益慈善模式較為盛行的國家和地區，土地和房產資產往往蘊含着巨大價值，同樣能夠服務於優先發展事項。例如，部分伊斯蘭公益慈善事業較為發達的國家可尋求提高與土地及物業相關的瓦克夫（waqf，永久捐贈）數據可見度。

39 Directorate of Zakat and Waqf Empowerment, Directorate General of Islamic Community Guidance, Ministry of Religious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Indonesia, “National Survey Estimates Indonesia’ s Annual Islamic Philanthropy at IDR 343 Trillion,” June 22, 2026.
英文原文為：“Indonesia possesses enormous potential in Islamic philanthropy. Our challenge is to ensure that this potential is managed more effectively so that it can generate greater impact in poverty reduction, community economic empowerment, education, and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Reliable survey data is essential for strengthening collaboration among the government, zakat institutions, waqf institutions, and other stakeholders to optimize the management and utilization of Islamic social finance.”

投資二：

借鑑增長經驗彙編，培育多元公益慈善模式

發展本土公益慈善模式，需要具前瞻性的領導與長期投入。本研究計劃在其涵蓋的各國家與地區內，針對五種公益慈善模式總結出十二套增長經驗彙編；當中六套僅計年度貨幣價值，運作規模已超過10億美元（約78億港元）（見圖13）。增長經驗彙編往往需時五至十年方能形成規模，甚至需要更長時間才能實現最初預期的影響。全數十二套增長經驗彙編的詳細說明載於附件1。

圖 13
12套增長經驗彙編中有6套能夠每年帶來超過10億美元的本土公益慈善捐贈

公益慈善模式	增長經驗彙編	**新興／已成規模**（已成規模指在至少一個國家或地區年規模達10億美元或以上）
社區／社群主導型	數碼化捐贈平台 中國、沙特阿拉伯	已成規模
	自助小組 印度	已成規模
信仰驅動型	積極的天課協調與制度化 印尼	已成規模
政府主導型	政府關聯機構 中國、泰國、阿聯酋	已成規模
	休眠存款 日本	新興
	非營利組織化 沙特阿拉伯	新興
企業主導型	強制性企業社會責任 印度	已成規模
	企業核心資源和能力 中國、印度	新興
	政府關聯企業協作平台 馬來西亞	新興
	企業故鄉稅 日本	新興
超高淨值人士主導型	社區影響力夥伴關係 沙特阿拉伯	已成規模
	家族辦公室金融中心 中國香港、新加坡	新興

各地可把握的發展機遇，在於識別具較大增長潛力的慈善模式，並探索適合本地情況的創新方法，推動其持續發展。在這方面，其他地區的增長經驗彙編和發展策略可作為重要參考。值得注意的是，研究所整理的增長經驗彙編大多透過政策工具或其他非稅務誘因的方式推動慈善發展，與區外普遍認為慈善發展主要依賴稅務優惠的觀念有所不同。由此可見，在推動慈善生態系統發展時，可運用的政策選項和推行方式十分多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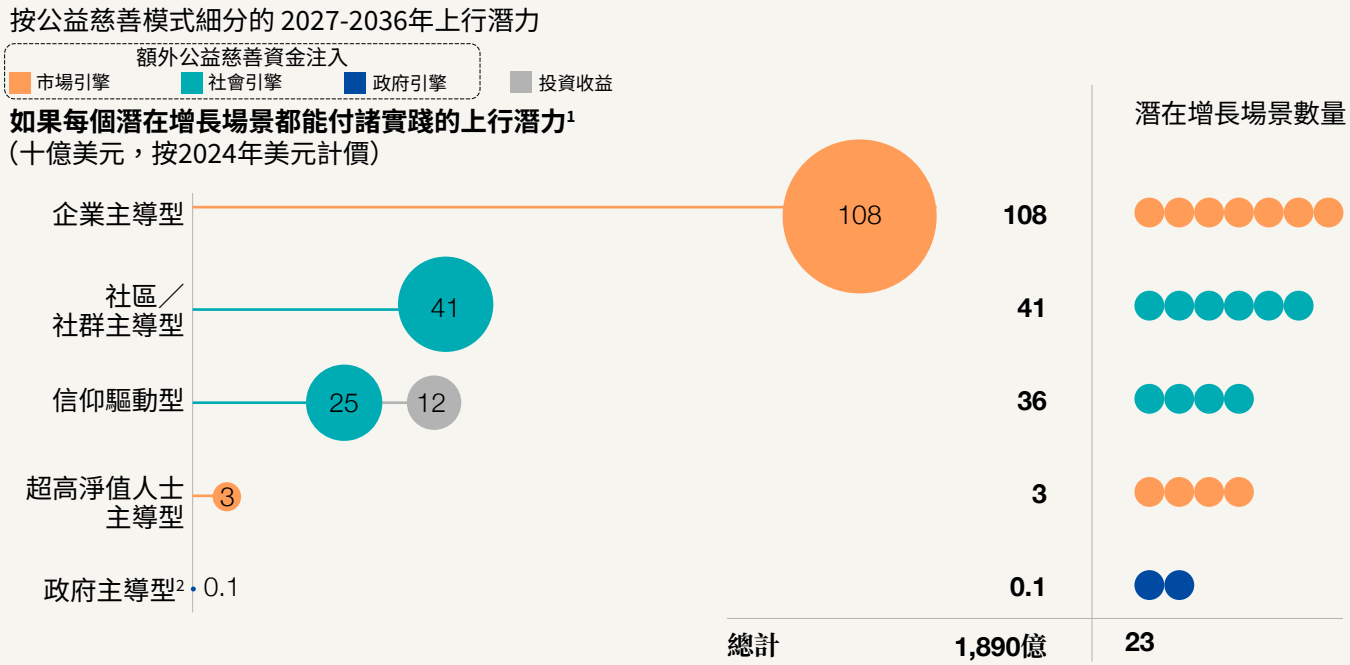
研究計劃估計，透過互學互鑑及進一步推動本土增長經驗彙編創新，可望在未來十年約1.5萬億美元（約11.7萬億港元）的自然增長基礎上，額外釋放1,890億美元（約1.47萬億港元）的資金（見圖14）。為評估這種上行潛力，各合作機構以增長經驗彙編為參照，為其所在國家和地區設想出23個可能情景，並以現有最佳數據進行估算。

啟航：聚焦發展本土公益慈善生態系統的閉門政策圓桌會議

閉門政策圓桌會議是與政策制定者及決策者就上行機遇展開對話的有效途徑。2026年2月研究計劃於利雅得召開會議期間，各合作機構與沙特阿拉伯的政策制定者舉行了一次閉門政策圓桌討論，向來自商務部、經濟與規劃部、沙特發展基金及宗教基金總局等機構的當地政策制定者介紹增長經驗彙編。與會政策制定者對此表達支持，並有意繼續就發展本土公益慈善生態系統展開討論，同時強調建立信任、提升透明度與多方協作等核心議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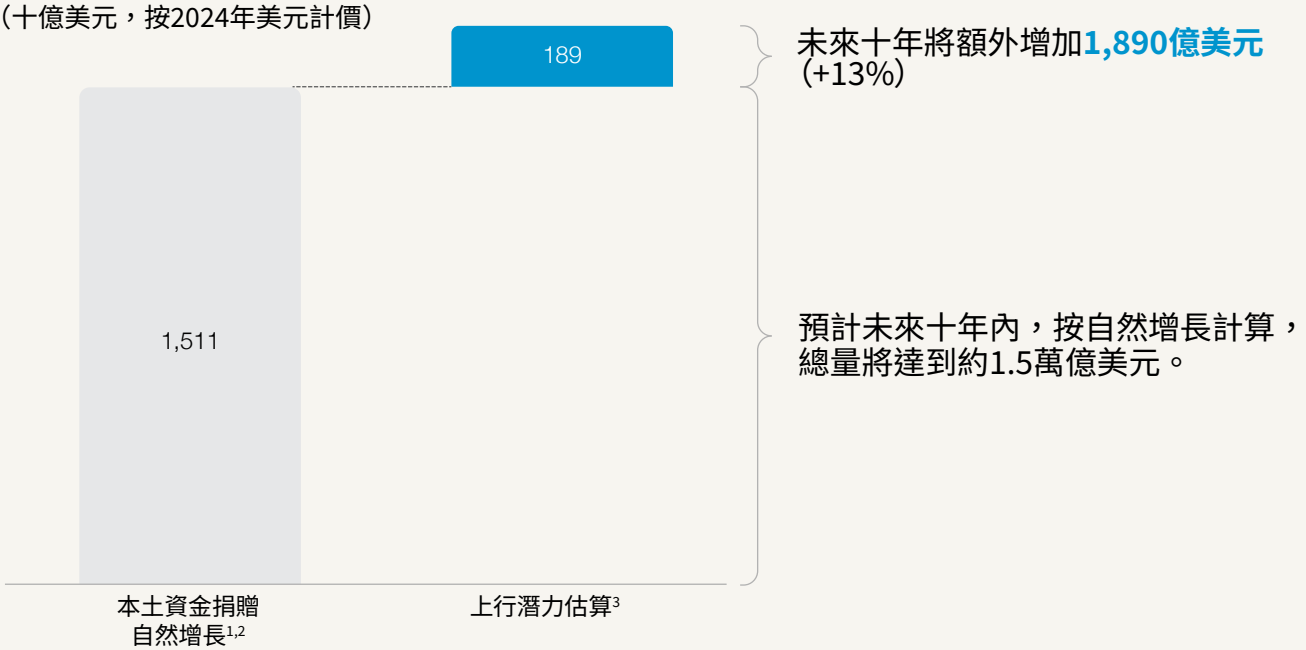
+1,890億美元 如果所有增長場景都能付諸實踐，未來十年內有望額外釋放的公益慈善資源

圖 14
2027年至2036年間研究計劃各夥伴國家和地區本土資金捐贈上行潛力估算



1. 由於四捨五入，總數可能不等於各分項之和；
2. 政府主導型的上行潛力可能相當大，但由於公共可支配公益慈善資源與當地情況及政策密切相關，故其潛在增長場景相對有限。

2027-2036年研究計劃各國家和地區資金資源總量估算
（十億美元，按2024年美元計價）



1. 不包括公益慈善生態系統投資收益。
2. 自然增長估算以經濟增長作為基礎，依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各國家與地區實際 GDP 增長的預測。
3. 上行潛力包括研究計劃確定的所有潛在增長場景。

專欄4：

上行潛力的估算方法

截至本報告發表時，亞洲尚未有任何全面估算能夠反映區內本地慈善捐贈的整體規模與範圍，亦缺乏具可信度的增長潛力評估。若僅以其他國家的高層次指標（例如慈善捐贈佔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比）推算亞洲的發展潛力，將忽略亞洲公益慈善生態系統的多元組成，以及區內各地在政策、稅務環境和國情方面的根本差異。有見及此，研究計劃在進行2024年的規模量化估算及潛在增長機遇評估時，採用了由下而上的研究方法。相關分析根據各地區的實際情況，建立具針對性的發展情景，並參考亞洲各地成長經驗彙編的實證證據。這些經驗均植根於區內真實的政治、經濟及文化環境，從而為評估慈善生態系統的未來發展空間提供更具實際基礎的判斷。

投資三：

將公益慈善生態系統納入國家發展規劃的重要戰略資產

負責規劃與統籌國家或地區發展策略的規劃部門與財政部門，可深入思考如何更充分地調動本國或地區完整的公益慈善生態系統，以最大化本土資源與能力的綜合效能，推動實現普惠包容與永續成長。

國家策略能夠提供共同的語言與框架，有助於實現公益慈善生態系統與三大引擎之間更深層的協作。以馬來西亞為例，財政部於2024年啟動了政府關聯企業活化與改革計劃（GEAR-uP），動員政府關聯公司（GLC）、政府關聯投資公司（GLIC）及其公益慈善力量，為兩大支柱作出貢獻：(1)「推動經濟發展」：加速半導體及能源轉型等高增長、高價值領域的產業轉型；(2)「提升人民福祉」：改善最弱勢社群的生活質量，確保包容性增長及最低生活工資保障。至2025年中，該計劃已為高增長、高價值產業籌集110億令吉（約26億美元，202.8億港元）資金，並保障15.3萬名員工每月獲得至少3,100令吉（約724.5美元，5,651.1港元）的生活工資。[註40][註41]

40 Ministry of Finance Malaysia, “Pre-Budget Statement 2025,” press release, July 30, 2024.
41 Ministry of Finance Malaysia, “MOF’ s GEAR-uP Mobilises RM11 Billion, Secures Living Wage Commitment for 153,000 Employees,” press release, June 30, 2025.

在「提升人民福祉」支柱下，馬來西亞財政部與「政聯企業為國為民服務」（GDRN：一個由政府關聯公司（GLCs）和政府關聯投資公司（GLICs）及其公益慈善事業組成的協作網絡，由哈桑娜基金會和馬來西亞電訊基金會共同擔任秘書處）緊密合作，協調各項公益慈善計劃，並與相關政府部門攜手，促進社區發展、民生和教育領域的跨領域學習。財政部承諾在2024至26年間每年提供至少1億令吉（約2,350萬美元，1.833億港元）的配套補助，並積極鼓勵協調各方力量，充分發揮整個網絡的專業知識、實體據點和執行能力的綜合優勢。[註 42]

中國在將公益慈善事業納入國家戰略規劃方面提供了具有參考價值的制度實踐。2019年，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首次將「重視發揮第三次分配作用，發展公益慈善等社會公益事業」寫入中央全會文件；2021年，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明確提出「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2026年「十五五」規劃綱要進一步要求「探索公益慈善有效實現形式」。這一系列頂層設計將公益慈善從社會保障的有限補充上升為國家治理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為公益慈善事業提供了清晰、穩定、可預期的制度環境。

以區域合作推動本土發展

上述三大本土投資領域，有助各國家與地區培育自身的公益慈善生態系統，並加速發揮對國家戰略與優先發展事項的影響力。下方圖表15載列衡量這些投資領域成效的初步框架。

各國家與地區將探索切合自身國情的發展道路。舉例而言，中國宋慶齡基金會委託學者撰寫有關中國公益慈善事業發展的報告，作為研究計劃的配套參考。[註 43]

研究計劃期待未來數年開展更深入的本土及區域交流。各國和地區之間有許多值得相互借鏡的經驗和實踐，故此區域合作能夠加速各國和地區本土公益慈善發展進程。

42 Anwar Ibrahim, “Belanjawan 2024 Speech by YAB Dato’ Seri Anwar Bin Ibrahim, Prime Minister and Minister of Finance, Introducing the Supply Bill (2024) in Dewan Rakyat” (speech, Kuala Lumpur, October 13, 2023), Ministry of Finance Malaysia; Government of Malaysia, Ministry of Finance, *Budget 2025 Touchpoints* (Putrajaya: Ministry of Finance, 2024); Government of Malaysia, Ministry of Finance, *Budget 2026 Touchpoints* (Putrajaya: Ministry of Finance, 2025).

43 中國宋慶齡基金會，《中國慈善研究報告》，2026。

在提升慈善數據可見度方面，雖然數據定義應因應各地實際情況而制定，但亞洲各地仍有明顯機遇建立共同原則和實務做法，使慈善數據更具透明度、更細緻、更易互通，並能為政策制定提供更具參考價值的分析和洞見。首先，可就慈善數據治理架構建立共同原則，涵蓋數據擁有權、問責機制及協調安排等共通議題，包括不同捐贈來源的數據，以及國家層面的整體數據管理。其次，可建立共同實務做法，推動具互通性和高質量的數據發展，涵蓋數據分類體系、數據收集方法及基礎設施建設，以支持長期、定期及一致的數據監測和分析。這項工作將有助建立重要的區域公共資源，不但能支援研究計劃各國家和地區間的交流和學習，也能讓其他地區受惠於持續累積的知識基礎和實踐經驗。[註 44]

在推動本地公益慈善模式發展方面，匯聚政策制定者及決策者分享實踐經驗，有助將各種發展願景轉化為可借鑒的行動路徑，推動區內創新與協作。視乎各地對特定增長經驗彙編的興趣和需求，亦可透過更聚焦的交流，深入探討具體執行安排和運作機制，加快政策落地。

至於國家發展目標的規劃與協調，雖然各地國情不同，但在運用本地公益慈善生態系統支援國家優先事項，尤其是在面對共同挑戰時，仍有不少值得互相學習之處。例如，農村及區域振興是中國、印度及日本的重要發展議程；應對人口老化，以及推進以預防和社區為本的醫療服務，是北京、香港、新加坡及東京等亞洲主要城市的共同關注；而在生成式人工智能迅速發展的新時代，提升技能、推動終身學習，並為青年創造更具希望的未來，則是所有地區共同面對的重要課題。

44 更多細節請見附件2。

圖15

構建衡量框架，以強化公益慈善生態系統，促進普惠包容與可持續增長

發現並培育本土公益慈善生態系統的發展資源與能力

加速提升對國家戰略和優先發展事項的影響力，邁向普惠包容與可持續增長

國家和地區級指標

更多資源貢獻被統計和／或新增

- 涵蓋四類來源的資金性資源：大眾個人捐贈、企業捐贈、公共可支配公益慈善資源、超高淨值人士捐贈

各公益慈善模式中有更多參與者貢獻發展能力

- 涵蓋五種模式：社區／社群主導型、信仰驅動型、企業主導型、政府主導型、超高淨值人士主導型

公益慈善生態系統助力更多國家戰略或優先發展事項取得更快、更好、更具性價比的規模化成果

- 注：致力於構建衡量方法，以評估公益慈善生態系統在國家戰略的背景下如何強化社會引擎，並增強政府、市場和社會引擎之間的協作機制

本土投資領域

1. **提升數據可見度**
2. **通過增長經驗彙編互學互鑑培育公益慈善模式**
3. **將公益慈善生態系統視為戰略資產，納入國家戰略的規劃與統籌之中**

區域投資領域

共同的原則、實踐、會議和其他定制的互學互鑑機制（將在最終報告進一步詳細說明）

最終報告展望

行動號召：
在未來一年與研究計劃攜手共繪行動藍圖，並肩開創未來十年

我們所追求的，遠不止於眼前的成果，而是一個更宏大的願景。各國家與地區的成功策略，將推動我們共同邁向2050年普惠包容與可持續增長的宏大目標。亞洲有能力成為全球的引領者，以確保發展成果惠及大眾，為下一代締造更美好世界為核心理念，探索多元豐富的發展路徑，建設持久和平、普世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綠色宜居的世界，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並為其他國家及地區提供啟示與借鑑。

亞洲各國基於自身文化傳統、政治體制和發展階段所累積的多樣化公益慈善經驗，成就人類文明互鑑的珍貴資料。透過攜手合作，互相學習本地公益慈善生態系統如何推動國家使命，我們能不斷重申並深化更廣泛區域合作的共同初心。無論是在科技創新、貿易、供應鏈韌性、安全合作，還是能源轉型等領域，攜手合作的目的如一：提升人民福祉、促進共同發展。

本中期報告旨在梳理亞洲各國家和地區公益慈善經驗與特色，為亞洲公益慈善事業交流提供平台，並為各國家和地區政策制定者及決策者分享意見，以共同推動亞洲公益慈善生態系統發展。

我們誠摯期望在未來一年與各方積極互動，就本報告的核心議題展開交流，共同探索推動區域公益慈善生態系統發展所需的行動，以促進普惠包容和可持續增長。相關討論成果將融入研究計劃2027年底最終報告中發表的行動路線圖，共同描繪亞洲公益慈善事業的未來願景。



鳴謝

本研究計劃的順利推動，全賴亞洲各國眾多政府部門、研究機構與學者，以及公益慈善生態系統持分者和中介機構的廣泛參與和支持。各方慷慨分享了有關亞洲公益慈善事業的數據與真知灼見。本報告的兩個附件合共引用超過280個獨立來源，共同為本研究計劃的研究和分析奠定堅實基礎。

本研究計劃在此特別感謝直接為本報告提供觀點與洞見的主管單位、學術研究人員、公益慈善生態系統實踐者及中介機構。研究計劃對所有參與研究的國家與地方均有進行實地調研，並按實際需要安排後續交流。以下鳴謝名單僅包含截至本中期報告發表時同意公開署名的個人與機構。[(註45)] 凡列於此處者，概不表示其須對本報告的準確性、內容、研究發現或建議承擔責任，亦不代表其全然認同本報告。本報告若有任何錯誤或遺漏，均由本研究計劃承擔全部責任。

45 以下按個人姓氏以及未列明個人的機構或團隊名稱的英文（或拼音）首字母排序。

- **Mohamed Azam Abdul Aziz**,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Warees Investments
- **Professor Dr Waryono Abdul Ghafur**, Director of Zakat and Waqf Empowerment, Ministry of Religious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Indonesia
  Direktur Pemberdayaan Zakat dan Wakaf, Kementerian Agama Republik Indonesia
- **Zulfirdaus Bin Abu Hassan**, General Manager, Asnaf Development Division, Lembaga Zakat Selangor
  Pengurus Besar, Divisyen Pembangunan Asnaf, Lembaga Zakat Selangor
- **Bhirawa Anoraga**, MA, PhD, Researcher, Social Trust Fund (STF) UIN Syarif Hidayatullah Jakarta
- **Rizky Bianco**, Directorate of Social and Economic Independence, Ministry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Planning (BAPPENAS) of the Republic of Indonesia
  Direktorat Kemandirian Sosial dan Ekonomi, Badan Perencanaan Pembangunan Nasional
- 北京惠澤人公益發展中心**中國志願服務發展指數測量課題組**
- **Sh. Balamurugan D**, IAS, Joint Secretary, Ministry of Corporate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former CEO JEEViKA, Bihar Rural Livelihoods Promotion Society, Ministry of Rural Development, Government of India
- **Sh. Narendranath Damodaran**, National Anchor, National Coalition for Natural Farming; former Executive Director, Professional Assistance for Development Action (PRADAN)
- **Development Intelligence Unit Analytics**
- **Directorate of Social Assistance Funding Source Management (PSDS)**, Ministry of Social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Indonesia
  Direktorat Pemberdayaan Potensi dan Sumber Daya Sosial, Kementerian Sosial Republik Indonesia
- **Professor Amelia Fauzia**, MA, PhD, Professor, Faculty of Arts and Humanities, UIN Syarif Hidayatullah Jakarta; Director, Social Trust Fund (STF) UIN Syarif Hidayatullah Jakarta
  Profesor, Fakultas Adab dan Humaniora, UIN Syarif Hidayatullah Jakarta; Direktur, Social Trust Fund (STF) UIN Syarif Hidayatullah Jakarta
- **Ferro Ferizka**, Senior Advisor to the Coordinating Minister for Human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Indonesia, Coordinating Ministry for Human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Indonesia
  Staf Khusus Menteri Koordinator, Kementerian Koordinator Bidang Pembangunan Manusia dan Kebudayaan, Kemenko PMK Republik Indonesia
- **Mona Hammami**, Partner and Head of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Oliver Wyman
- **Professor Nur Hidayati**, MA, PhD, Researcher, Social Trust Fund (STF) UIN Syarif Hidayatullah Jakarta
- **Sri Hidayati**, MEd, Researcher, Social Trust Fund (STF) UIN Syarif Hidayatullah Jakarta
- 海南亞洲公益研究院院長**黃浩明教授**
- **Japan Network for Public Interest Activities (JANPIA)**
  日本民間公益活動連携機構
- **Kasikorn Research Center**
  บริษัท ศูนย์วิจัยกสิกรไทย จำกัด
- **Dinar Dana Kharisma**, PhD, Director for Social and Economic Independence, Ministry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Planning (BAPPENAS) of the Republic of Indonesia
  Direktur Kemandirian Sosial dan Ekonomi, Badan Perencanaan Pembangunan Nasional
- **Tatsuaki Kobayashi**, Professor and Senior Researcher, Center for Sustainability Management, Tama University
  多摩大学サステナビリティ 経営研究所教授・主任研究員 小林 立明
- **Sh. Anish Kumar**, Transforming Rural India Foundation
- 清華大學公益慈善研究院院長**藍煜昕**

- 香港金融發展局高級經理(政策研究)**李恩如**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李健教授**
-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馬京晶教授**
- **Maliki**, PhD, Deputy Minister for Community Empowerment, Population, and Employment, Ministry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Planning (BAPPENAS) of the Republic of Indonesia
  Deputi Bidang Pemberdayaan Masyarakat, Kependudukan, dan Ketenagakerjaan, Badan Perencanaan Pembangunan Nasional
- **Sh. Aman Mittal**, IAS, Joint CEO, Maharashtra Institution for Transformation, Planning Department, Government of Maharashtra, India
- **Professor Burhanuddin Muhtadi**, MA, PhD, Executive Director, Indikator Politik Indonesia
- **Rungsun Munko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xpert, Thai Health Promotion Foundation
  นายรังสรรร มันคง, ผู้เชี่ยวชาญด้านวิเทศสัมพันธ์ สำนักพัฒนาภาคีสัมพันธ์และวิเทศสัมพันธ์, สำนักงานกองทุนสนับสนุนการสร้างเสริมสุขภาพ
- **Srikrishna Sridhar Murthy**, Co-founder and CEO, Sattva Consulting
- **Professor Adil Najam**, Dean Emeritus and Professor, Frederick S. Pardee School of Global Studies, Boston University
- **Dr Amelia Nur Natasha Nazeri**, Research Fellow, Centre of Excellence for Islamic Social Finance, INCEIF University
- **Sh. Praveen Pardeshi**, Retd. IAS, CEO, Maharashtra Institution for Transformation, Planning Department; Chief Economic Advisor to the Chief Minister, Government of Maharashtra, India
- **Michele Petochi**, Advisor, Labor Market and Social Issues, Riyadh
- **Hendro Prasetyo**, PhD, Director, Indikator Politik Indonesia
- **Professor Dr Amir Shaharuddin**, Director, Centre of Excellence for Islamic Social Finance, INCEIF University
- **Sarah Shaw**,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Majra – National CSR Fund
- **Sh. Nagendra Nath Sinha, Retd.** IAS, Former Secretary, Ministry of Rural Development, Government of India
- **Social Impact, Technology & Transformation team**, Deloitte Touche Tohmatsu India LLP
- **Boonwara Sumano**, PhD, Senior Research Fellow, Thail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ดร. บุญวรา สุมะโน, นักวิชาการอาวุโส, สถาบันวิจัยเพื่อการพัฒนา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
- 易善數據創始人兼總裁**陶澤**
- **Sumit Tayal**, CEO, Give
- **Jinny Uppal**, Director and Head of Centre for Social Impact and Philanthropy, Ashoka University
- 北京師範大學中國公益研究院創始院長**王振耀教授**
- **Yayasan Waqaf Malaysia**
- 北京師範大學風險治理創新研究中心主任**張強教授**

本研究計劃同時向亞洲公益慈善研究計劃參與方及報告製作團隊的全體成員致以誠摯謝意，感激他們對本中期報告的寶貴貢獻。

亞洲公益慈善研究計劃參與方

合作機構

- 中國宋慶齡基金會
- Erth Zayed Philanthropies：**HE Dr Mugheer Khamis Al Khaili**、HE Amal Saleh Al Braiki、Dr Hamad Al Darmaki、Mariam Al Hosani、Karama Al Katheeri、Sufanah Hamza、Amy Smith、Zainab Al Mulla
- 開泰基金會（Kasikornthai Foundation）：**Kobkarn Wattanavrangkul**、Pipit Aneaknithi、Anan Lapsuksatit、Siwat Luangsomboon、Puthita Kachintorn
- 哈立德國王基金會（King Khalid Foundation）：**HH Princess Nouf Muhammad AlSaud**、Osamah Alhenaki、Rahaf Al Sanosi
- 皮拉馬爾基金會（Piramal Foundation）：**Aditya Natraj**、Manmohan Singh
- 陳江和基金會（Tanoto Foundation）
- 塔塔諮詢服務公司（Tata Consultancy Services）：**Shailja Mehta**、Balaji Ganapathy（前首席社會責任官）、Sunil Joseph
- 淡馬錫基金會（Temasek Foundation）：**黃文雄（Ng Boon Heong）**、曾采依（Charina Chan）、吳億駿（Goh Ek Jun）、王誨敏（Crystal Ong）、陳慧妍（Debbie Chan）、Audrey Sukotjo、林音綺（Lim Ying Kit）、陳萱霖（Chin Shuen Lin）
- 騰訊公益慈善基金會：**肖黎明**、張帆
-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梁卓偉**及其團隊
- 日本財團（The Nippon Foundation）：**Ichiro Kabasawa**、Takehiro Umemura
- Yayasan Dompet Dhuafa Republika：**Ahmad Juwaini**、Bobby Porman Manullang、Haryo Mojopahit、Prasetyo Wibowo
- 哈桑娜基金會（Yayasan Hasanah）：**Siti Kamariah Binti Ahmad Subki**、Sharifah Norjumiza Binti Syed Agil、Aditi Malhotra、Danial Sharif Bin Mustaffa、Nur Shaadah Binti Zulkifli、Nur Dina Farhana Binti Zu

聯合召集機構

- 公益慈善研究院（Institute of Philanthropy）：**辛保運**、鄭穎怡、趙浩謙、朱麗盈、關芷宜、施美鈴、溫愛萍、王紅、俞曉欣、岳崢洸
- 亞洲慈善大會（Asia Philanthropy Congress）：**Masato Seko**（前高級總監，The Nippon Foundation）

研究秘書處

- 明丘（Voyage）：洪偉龍、陳芷琦、金宥利、孫文軒、Annu Mehta、孫維佳、趙莉清、蕭晴之、蘇媛、王碹意、鄭以津、阮坤鴻、黃巧欣、劉熙雯、Kanishka Bhattacharya、華洛薇（Lola Woetzel）（高級顧問）

平台合作夥伴

- 亞洲公益創投網絡（AVPN）：**Naina Subberwal Batra**

報告製作團隊

- 編輯團隊：Janet Bush、Colin Douglas、Anne Taylor
- 設計團隊：Courtney Cox、Limika Nel
- 翻譯團隊：博然思維集團及其團隊、陳灝然
- 印刷團隊：黃鎮康、徐愛倫

詞彙表

A. 研究計劃的術語定義

- **協同機制(Collaborative infrastructure)：**能夠建立信任，並促使政府、社會與市場三大引擎中的眾多參與主體圍繞共同使命有效協作的制度、機制、慣例與渠道。此類機制通常位處於不同引擎之間的界面處，以推動高效且可規模化的協作。
  - **政府與市場界面(State<>market interface)：**政府主體與市場主體之間的互動。例如，可透過公私合作平台及／或融資機制，激勵私營部門的投資流向發展相對滯後的地區。
  - **政府與社會界面(State<>community interface)：**政府主體與社會主體之間的互動。例如，可透過數碼平台讓社區居民參與集體決策、反映問題，或就政府或社會組織的服務供給提出反饋意見及建議。
  - **社會與市場界面(Community<>market interface)：**社會主體與市場主體之間的互動。例如，可透過強村公司及農民合作社網絡，讓社區層面的生產者接入更廣闊的市場價值鏈。
- **增長經驗彙編(Growth playbook)：**各國家與地區為培育本土公益慈善模式而量身制定的方法與政策。研究計劃在亞洲各國家與地區總結出12套增長經驗彙編，可支持區域公益慈善生態系統之間互學互鑑、相互啟發。增長經驗彙編涵蓋五種公益慈善模式：(1)社區／社群主導型；(2)信仰驅動型；(3)企業主導型；(4)政府主導型；(5)超高淨值人士主導型。
  - **規模化增長經驗彙編(At-scale playbook)：**六套已實現規模化、每年推動至少10億美元(約78億港元)資金性捐贈的增長經驗彙編。
  - **新興增長經驗彙編(Emerging playbook)：**六套尚未實現規模化，但具備發展潛力，並能為亞洲各國家與地區提供借鑑的增長經驗彙編。
- **行動路線圖(Action roadmap)：**為支持區域性行動、推動亞洲公益慈善生態系統在未來十年助力普惠包容與可持續增長，而提出的投資與行動戰略機遇綱要。路線圖將納入研究計劃的最終報告。
- **公益慈善生態系統(Philanthropic ecosystem)：**研究計劃所指的公益慈善生態系統，是由五種公益慈善模式共同構成的本土生態系統。各國家與地區可立足自身實際，對其中不同模式有所側重。
- **公益慈善(Philanthropy)：**研究計劃將公益慈善定義為：超越財政或商業義務，為他人福祉而自主分配私人或公共資源。
- **公益慈善模式(Philanthropy models)：**研究計劃依據不同參與主體來界定公益慈善模式。所謂參與主體，是指為他人福祉而籌集和分配公益慈善資源與能力者，於籌集和分配方面，涵蓋自主營運項目及向第三方提供捐贈。研究識別出共同推動本土捐贈的五種公益慈善模式：社區／社群主導型、信仰驅動型、企業主導型、政府主導型和超高淨值人士主導型。五種模式是透過實證研究歸納得出，依據的是亞洲各國家和地區面向不同參與主體、為公益慈善目的而就資源與能力的培育、籌集與分配所量身制定的政策與方法(記錄於增長經驗彙編中)。
- **公共可支配公益慈善資源(Public discretionary giving)：**政府引擎向公益慈善生態系統注入的新資源。其用途必須符合規定(用於財政職責之外的公共利益)且必須有健全的資金分配管治架構。

- **資源流（Resource stream）：**流入本土公益慈善生態系統或在系統內部產生的、可明確識別且彼此有別的資金性或非資金性資源渠道。
  - **新增公益慈善資金流入（New philanthropic monetary inflows）：**新投入公益慈善用途的資金性資源，包括大眾個人、企業、超高淨值人士捐贈以及公共可支配公益慈善資源。
  - **志願服務時間／義工服務時間（Voluntary time contributions）：**個人在不期望直接個人回報的情況下自願貢獻的時間，服務對象為其家庭或家族以外的組織、社區或個人。
  - **公益慈善生態系統資產收益（Income from assets in philanthropic ecosystems）：**公益慈善生態系統內已有捐贈基金或資產，包括公益慈善組織資產和信仰類資產，所產生的收益。
- **三大引擎（Societal engines）：**大規模推動社會發展的主要力量，包括政府、社會與市場。在亞洲，三大引擎均參與公益慈善事業。
- **捐贈來源（Sources of giving）：**公益慈善資源的原始來源，有別於下游接收、管理或分配相關資源的組織。捐贈來源包括大眾個人、企業、超高淨值人士和公共可支配公益慈善資源。
- **政府關聯機構（State-affiliated institutions）：**本報告所指的政府關聯機構，是指由政府出資或設立、負責籌集及分配公益慈善資源的機構。
- **潛在增長場景（Stories of possibility）：**由各國家與地區的合作機構參照附件1「亞洲公益慈善增長經驗彙編」，設想透過有意識地培育公益慈善模式而實現捐贈規模增長的場景。

B. 通用術語

按公益慈善模式分類

社區／社群主導型

- **社區韌性（Community resilience）：**社區以可持續的方式應對、承受、恢復和適應自然災害或經濟衝擊等不利情況的能力。
- **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社區或社群成員所共享的網絡、信任、價值觀與規範，能夠促進協調與合作，實現共同利益。

企業主導型

- **核心資源和能力（Core assets and capabilities）：**企業可用以為公共利益作出貢獻的核心資源與專業能力，包括產品及服務、技術、知識與人力資本、實體及基礎設施、商業網絡以及品牌資產。
- **企業故鄉稅（Corporate hometown tax）：**日本的一項稅務優惠政策，容許企業透過向符合支持區域振興此國家優先發展事項的項目捐贈，以獲得稅務優惠。
- **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指企業應當對其所處社會承擔責任的理念。通常涵蓋公益慈善、環境、倫理與經濟等維度，即企業在追求利潤之外，將社會責任實踐納入經營和決策。[(註46)]不同國家和地區對企業社會責任的監管和問責採取不同方式，從自願自律（如日本）到以法律強制要求支出和資訊披露（如印度《2013年公司法》）不等。
- **包容性商業（Inclusive business）：**在商業可持續的前提下，為經濟脆弱和邊緣群體提供生計機會及／或擴大其獲得基本商品與服務的途徑的商業模式。[(註47)]

46 Tim Stobierski, “What I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4 Types,”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Online*, July 10, 2026.
47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IFC）, “Inclusive Business at the Base of the Pyramid,” 2026年7月訪問.

信仰驅動型

- **瓦克夫(複數：awqaf/awkaf；單數：waqf/wakaf)：**瓦克夫資產是通常被永久撥作宗教、公益慈善或公共利益用途的伊斯蘭捐贈資產。資產產生的收入和回報可用於慈善目的，或按照瓦克夫契約的規定分配予受益人。由於該詞存在多種拼寫方式，本報告各國家與地區相關章節採用當地通行拼寫。
- **信仰類資產(Faith-based assets)：**宗教組織或信仰團體為宗教、公益慈善或公共利益目的撥作的資產，例如瓦克夫資產。
- **自願捐贈和施捨(Infak and sedekah)：**任何形式的自願公益慈善捐贈。
- **宰牲儀式(Qurban)：**古爾邦節期間舉行的一項宗教獻牲儀式，作為敬主功修的一種形式。
- **開齋天課(Zakat fitrah)：**齋月結束時，每個有足夠能力的穆斯林都必須繳納的一種義務捐贈(按每人一定數量的大米或主糧計算)。
- **財產天課(Zakat mal)：**一種年度義務捐贈。穆斯林的財富超過最低門檻後，須按財富的2.5%繳納。

政府主導型

- **休眠存款(Dormant deposits)：**賬戶持有人或法定繼承人在法定期限內未領取的休眠銀行賬戶及其他符合條件的儲蓄工具中的資金。因此，這些資金可作為政府重新分配用於公共福利用途的資金來源。
- **彩票公益金／獎券基金(Lottery Fund)：**從彩票收益中籌集並用於特定公共利益目的的資金。
- **配對資金／配對捐款(Matching funds/matching grants)：**按照一定比例匹配非政府主體的公益慈善捐贈，以帶動更多資源投入的公共資金。
- **非營利化(Non-profitisation)：**將組織或資產從政府所有轉移至非營利部門的一種做法。
- **專項徵費(Ring-fenced levies)：**指定徵費收入專用於達成特定的公共利益目標，且不得用於政府一般性開支。

超高淨值人士主導型

- **家族辦公室(Family office)：**為一個富裕家族(單一家族辦公室)或多個富裕家族(聯合家族辦公室)管理投資、財富規劃、管治及相關事務的私人機構。
- **金融中心(Financial hub)：**銀行、資產管理等金融活動高度集中的城市。
- **耐心資本(Patient risk capital)：**重視長遠社會影響多於財務回報的資本。

按國家和地區分類

中國

- **共同富裕(Common prosperity)：**共同富裕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中國提出，到「十四五」末，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邁出堅實步伐，居民收入和實際消費水平差距逐步縮小；到本世紀中葉，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實現，居民收入和實際消費水平差距縮小到合理區間。[註48]
- **東西部扶貧協作(East-West Cooperation in Poverty Alleviation)：**中國為減少貧困、推動共同富裕實施的一項重大政策。通過組織東部發達省市與西部貧困地區開展結對協作，鼓勵較發達地區以民間投資、社會幫扶和人才支持等多種形式提供支援。[註49]
- **鄉村振興(Rural revitalisation)：**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七大戰略之一。鄉村振興戰略強調農村發展的重要性，包括實現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註50]
- **社會組織(Social organisation)：**包括社會團體、基金會和社會服務機構。社會團體是由中國公民自願組成的非營利性法人；基金會是按照章程開展活動，利用捐贈財產從事公益事業的非營利性法人；社會服務機構是由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組織利用非國有資產舉辦，按照章程提供公益性社會服務的非營利性法人。[註51]
- **央企(Central State-owned enterprise, central SOE)：**由中國政府所有，並由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監督管理的企業。

印度

- **克若爾(Crore)：**印度數字計量單位，等於1,000萬(10,000,000)。
- **國家農村生計發展計劃(DAY-NRLM (Deendayal Antyodaya Yojana — National Rural Livelihoods Mission))：**印度政府農村發展部實施的旗艦減貧計劃，主要目標是透過將貧困家庭組織為自助小組，並賦予他們可持續的生計機會和金融服務來減少農村貧困。
  - **邦農村生計發展計劃(State Rural Livelihoods Mission(s), SRLM(s))：**由政府支持、負責執行國家農村生計發展計劃的邦級機構。
  - **自助小組(Self-help groups, SHGs)：**由10至20名社會經濟背景相近的女性組成的團體，基於儲蓄與信貸紀律、責任共擔和同儕決策開展運作。
- **JEEViKA：**比哈爾邦農村生計促進協會(比哈爾邦SRLM)。
- **拉克(Lakh)：**印度數字計量單位，等於10萬(100,000)。
- **十萬克若爾(Lakh crore)：**印度數字計量單位，等於1萬億(1,000,000,000,000)，即10萬個克若爾。
- **MYRADA(Mysore Resettlement and Development Agency)：**邁索爾安置與發展機構。
- **NABARD(National Bank for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印度國家農業和農村發展銀行。
- **PRADAN(Professional Assistance for Development Action)：**專業援助促進發展行動。

48 習近平，《紮實推動共同富裕》。
49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人類減貧的中國實踐》白皮書。
50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鄉村振興戰略」，2022年7月13日更新。
51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社會組織」，2024年12月10日更新。

馬來西亞

- **GDRN：**最初成立時名為「政府關聯公司（GLC）和政府關聯投資公司（GLIC）災害響應網絡」。2022年更名為「政聯企業為國為民服務」，縮寫仍為GDRN。
- **GEAR-uP（Government-linked Enterprises Activation and Reform Programme）：**政府關聯企業活化與改革計劃。
- **政府關聯公司（Government-linked company，GLC）：**由政府關聯投資公司（GLIC）或法定機構投資並控制，以開展商業活動為主要目的的公司。[註 52]
- **政府關聯投資公司（Government-linked investment company，GLIC）：**馬來西亞聯邦政府投資實體，對其投資的公司（即GLC）持有控制性權益。[註 53]

其他術語

- **資產管理規模（Assets under management）：**投資管理人、金融機構或基金代表客戶或受益人管理的資產總市值。
- **自下而上估算（Bottom-up estimate）：**匯總各個實體報告的數據而得出的估算。
- **公益慈善組織（Charitable organisation）：**為公益慈善目的而設立的非營利組織；不同國家和地區對慈善目的的界定可能有所不同。
- **推演（Extrapolation）：**運用已有數據中觀察到的比率、規律或基準，對更廣泛的人口、數據時段或國家和地區中未被直接觀察到的數值進行估算的過程。
- **捐贈（Giving）：**公益慈善捐贈。
  - **跨境捐贈（Cross-border giving）：**跨越國家和地區邊界進行的捐贈。
  - **本土捐贈（Domestic giving）：**捐贈人在其所在國家或地區內部進行的捐贈。
  - **正式捐贈（Formal giving）：**透過正式組織或實體進行的捐贈。
  - **實物捐贈（In-kind giving）：**以商品、產品、物資或其他有形資源而非資金形式進行的捐贈。
  - **非正式捐贈（Informal giving）：**非透過正式組織或實體進行的捐贈，包括直接向有需要者提供的捐贈，或透過可能未經登記的社區實體或宗教場所進行的捐贈。
  - **資金性捐贈（Monetary giving）：**以現金或現金等價物形式進行的捐贈。
  - **非現金貢獻（Non-cash contribution）：**以非現金形式作出的捐贈，包括股份、實物、資產、能力和志願服務等。
  - **宗教捐贈（Religious giving）：**向宗教組織或為宗教目的進行的捐贈，不包括個人購買宗教用品或材料。
- **管治架構（Governance architecture）：**系統或機構賴以運作的角色、問責、決策和協調的結構。
- **影響力投資（Impact investment）：**旨在同時產生可衡量的社會或環境積極影響和財務回報的投資。
- **普惠包容與可持續增長（Inclusive and sustainable growth）：**為社會所有群體創造機會並改善生活水平，同時保護環境資源，支持社會、經濟和環境長期福祉的經濟增長。其定義與範圍可因國家和地區而異。
- **國家與地區（Jurisdiction）：**法院或政府機構可依法行使立法、行政或司法權力的領土範圍。
- **最後一公里網絡（Last-mile network）：**將服務、資源、支持和公益慈善貢獻直接送達個人與社區的本地組織、機構和社區參與主體。

52 Government Investment Companies Division（GIC）, Ministry of Finance Malaysia,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FAQ）,” Putrajaya: Ministry of Finance Malaysia, PDF, 2026年7月訪問。
53 GIC, Ministry of Finance Malaysia,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FAQ）,” 2026年7月訪問。

- **大眾個人（Mass individuals）：**構成社會公眾的個人。
- **非營利組織（Non-profit organisation，NPO, 港譯：非牟利組織）：**為公益慈善、社會或公共利益目的設立，而非以營利為目的並進行私人分配的組織。非營利組織是一個統稱，並非單一法律形式；各國家與地區可能對具備此類特徵的實體另有定義及／或規定具體法律形式。
- **分類法（Taxonomy）：**按照一套明確的類別和規則，對數據、概念或活動進行分類與歸類的結構化框架。
- **三角驗證（Triangulation）：**透過比較多個數據來源或計算方法所得結果，對估算進行驗證、交叉核對並增強研究發現可靠性的過程。
- **超高淨值人士（Ultra-high-net-worth individual，UHNWI）：**淨資產超過3,000萬美元（約2.34億港元）的個人。
- **志願服務／義工服務（Volunteering）：**個人在不期待直接個人回報的情況下自願開展的工作或活動，服務對象為其家庭或家族以外的組織、社區或個人。
- **正式志願服務／正式義工服務（Formal volunteering）：**透過正式組織開展的志願服務。
- **非正式志願服務／非正式義工服務（Informal volunteering）：**在非正式或社區場景中開展的志願服務。

請掃描二維碼繼續閱讀附件

- **附件一：**亞洲公益慈善模式增長經驗彙編
- **附件二：**量化方法，各國家與地區估算和建議